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1939  
9 July 1976

CHINESE

第一九三九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星期五下午三时三十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芬奇先生

理事国：贝宁

中国

法国

圭亚那

日本

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

巴基斯坦

巴拿马

罗马尼亚

瑞典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

美利坚合众国

(意大利)

帕基先生

赖先生

勒孔特先生

杰克逊先生

安倍先生

基希亚先生

米尔扎先生

伊留埃卡先生

达特库先生

森德贝格先生

哈尔拉莫夫先生

理查德先生

萨利姆先生

斯克兰顿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二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五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下午五时五十五分会议开始

向前任主席致谢

主席：作为安全理事会的主席，我首先要向我的前任圭亚那外交部长、尊敬的弗雷德里克·威尔斯并向他的同胞、我们在此的同事拉什利·杰克逊大使说几句话。我愿以安理会所有理事国和我个人的名义，对他们在担任主席期间主持十五次正式会议和许多协商时的贡献和技巧，表示我们的崇敬与感激。安全理事会曾面临着许多微妙而复杂的问题，但是多亏主持我们会议的人以智慧、耐心、伟大的公正无私和可敬的光明磊落态度那样有效地引导了会务的进行，以致我可以很高兴地在此指出，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未经完成就移交给七月份的主席的。因此，我可以代表所有的同事对圭亚那代表团在上月份所做的工作表达我们的感谢。

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故的朱德先生致敬

主席：我要代表安理会向中国代表团转达我们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的逝世的最诚挚悼念，他是同中国历史密切联系一起的一位杰出政治人物，全心全意地把他的一生贡献了他的国家。

通过议程

主席：安理会今天下午的会议的临时议程载于S/Agenda/1939号文件内。我知道苏联代表想在这方面作简短的讲话。

哈尔拉莫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在通过议程以前，我要确定一下我们对当前的案文所载的问题都有明确的了解。我们相信，同时我们了解，引

号内的字眼“侵略行为”是取自非洲统一组织主席，毛里求斯总理所发的电报(S/12126, 附件)的，这一电报指出了“以色列向乌干达发动的这次史无前例的侵略”。  
希望大家记住这点。

主席： 苏联代表的发言已经记录了下来。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就认为我刚才提到的文件所载的议程已经通过了。

议程通过。

非洲统一组织现任主席毛里求斯总理就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发动的“侵略行为”提出的控诉

- (a)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非洲统一组织驻联合国助理执行秘书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126)
- (b) 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毛里塔尼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128)
- (c)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12123)
- (d) 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乌干达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2124)

主席： 我要提请安理会注意同刚才列入议程的项目有关的一些安全理事会文件。除了议程上的(a)、(b)、(c)和(d)所列的文件外，安全理事会主席还收到了若干有关此事的其他通信。它们是：第一，七月七日肯尼亚常驻代表团代办的信(S/12131)；第二，七月八日阿尔及利亚常驻代表团给秘书长的普通照会，其中转送了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给秘书长的信(S/12132)；第三，美利坚合众国常驻代表今天的一封信，其中转送了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取缔非法劫持飞机(劫机)的海牙公约》全文，载在S/12134号文件里。

就在今天下午的会议之前，安全理事会主席也分别收到了七月八日和九日索马里和墨西哥常驻代表的信，这些信将尽快作为 S/12136 号和 S/12135 号文件分发。

现在我要告诉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我收到了下列几个会员国的来信，要求被邀参加讨论安理会当前审议的问题：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几内亚、以色列、肯尼亚、毛里塔尼亚、毛里求斯、卡塔尔、乌干达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按照《宪章》第三十一条和《临时议事规则》第三十七条的规定，我提议安理会按照惯例，同意邀请这些国家的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既然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由于安理会议席的座位有限，请以色列、毛里求斯和乌干达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请刚才提到的其他几位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按照惯例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向安理会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的邀请，以色列代表赫佐格先生、毛里求斯代表哈罗德·沃尔特爵士和乌干达代表阿卜达拉先生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代表冯韦希马尔先生、几内亚代表卡马拉先生、肯尼亚代表韦亚基先生、毛里塔尼亚代表哈桑先生、卡塔尔代表贾马勒先生和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奥约诺先生在安理会会议厅旁边保留给他们的座位就座。

主席： 安理会现在开始审议当前的议程项目。

秘书长要求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秘书长： 主席先生，我要同你一起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已故的朱德委员长致敬。当我收到了他去世这个令人悲痛的消息的时候，我就立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致送了一封信电。他无私而卓越的领导不仅将为他自己的国家，也将为全世界所长久纪念。我要借这个机会再次向赖亚力大使和中国常驻代表团的成员转达我最诚挚的悼念。

谢谢安理会允许我在这场重要辩论开始的时候就有机会发言。正如安理会各

理事国一定都知道的，我从非洲回来之后，就立即在七月八日发表了一个公开讲话，其中我详细说明了我在促成恩德培人质的释放的努力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也说明了我在从非洲回到纽约的途中我对这一事件所作的各种讲话。

当然，安理会当前审议的案件引起了若干复杂的问题，因为在这个事例中，一个国家对于劫机行动的结果所作出的反应，还涉及到影响另一个主权国的行动的问题。

诚然，在答复一个具体问题时，我说过：

“我还没有获得所有的详情，但是有一点似乎很清楚的，以色列飞机曾降落在恩德培，这构成了对联合国一个会员国的主权的严重侵犯”。

以我作为本组织秘书长所担负的责任，我认为我有义务维护每一个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的原則。

但是，我也充分认识到这并不是用来考虑安理会今天所讨论的这类案件的唯一因素。当国际社会需要在目前处理因国际恐怖主义行动而产生的前所未有的问题时，情形更是如此。这些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曾经受到我一贯的谴责，它们招致了许多人道、道德、法律和政治性质的问题，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大家同意的规则或解决办法。

对于无疑地会向安理会提出的各种立场，当然是要由安理会本身来判断这个案件的是非曲直。

在结束时，我希望尽管会有各种强烈的观点在这场辩论中出现，安理会还是会找到一个方法，为世界社会指出一个建设性的方向，使我们可以免去过去人间悲剧的重演和现在安理会正要审议的这种国家之间的冲突。

赖亚力先生（中国）：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不幸在北京逝世。

朱德委员长是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卓越领导人之一。他的逝世是中国人民的巨大损失。

在今天的安理会上，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阁下向中国代表团表示了对朱德委员长逝世的悼念。我谨借此机会，以中国代表团的名义，向安理会主席和秘书长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将向中国政府和人民转达这些诚挚的情谊。

谢谢主席先生。

主席：谢谢中国代表对秘书长和代表整个安理会发言的安理会主席的客气话。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位是乌干达代表、乌干达外交部长朱马·奥里斯·阿卜达拉中校阁下，我现在请他发言。

阿卜达拉先生（乌干达）：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请求召开安全理事会会议审议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侵犯乌干达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乌干达代表团愿向它们表示感谢。我国代表团也愿感谢你，主席先生，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理事国同意召开这个会议。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八日东非时间四时左右（格林威治时间一时），乌干达共和国终身总统，元帅伊迪·阿明博士阁下得到恩德培机场空中交通管制的电话通知说，一架被劫持的法国飞机，载有乘客二百五十人，在恩德培上空盘旋，机上汽油只够十五分钟飞行，请求许可降落。

阿明总统当时处境是进退两难：不许可飞机降落，则机上所有的人很可能遭到机毁命丧的危险，许可飞机在恩德培降落，就要面临劫持情况的后果。

注意到这些事情并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总统下令许可该飞机在恩德培机场安全降落。同时派保安部队一分队在机场驻守，以防范可能发生任何危险。为了避免妨碍正常的空中交通并使乌干达当局可以查明劫持人的性质来历，所以指示该飞机从地面上开到大约一哩以外的旧机场。

经过几小时才和劫持飞机负责人取得初步接触。在初步接触后，乌干达当局获悉飞机劫持人是“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的成员，他们在机上有二百五十个不同国籍和不同年龄的人质。劫持人说，他们不许任何人走近飞机，无论乌干达当局打算做什么保安安排，各有关保安人员不得走近飞机周围五十米以内。经过和劫持人进一步协商，乌干达总统才能说服他们容许向人质供应食物和饮料。这时劫持人通知乌干达当局，他们正在等候领导人的指示，因此要求乌干达当局把他们在恩德培着陆的事发表。而且就在这时他们发表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一般性政策的冗长声明，要求尽可能广为宣传。

乌干达政府为了这些人质起见，极力进行合作，并同意由乌干达广播公司重复广播并由当地报纸发表这项声明，使劫持人满意。

乌干达当局的原意是对劫持人供给飞机燃料和食品，要求他们向他处飞行。可是他们非常不愿，在没有同他们的领导人接触和发表他们劫持目的之前，他们拒绝飞往他处。那一天局面就这样继续下去，其间阿明总统亲自处理这个需要技巧和十分微妙的协商，结果劫持人同意把仍在他们看守下的人质移出飞机安全送到旧机场大楼。这个动作是很难的，在进行时劫持人非常急躁，非常怀疑乌干达当局可能要采取解除武装的行动。此举需要把飞机尽可能移近旧机场过境乘客休息室。为了此事劫持人要求首先检查过境乘客休息室和整个大楼，以确保他们自己和人质的安全。因此他们当中有些人走到飞机前面先在战略位置放了炸药，并且要求乌干达保安部队撤退到距离飞机终点大楼二百米的地方。

这里还应该提到，劫持人除了高爆炸力的炸药和手榴弹外还有自动武器。正如乌干达已在有关劫持的各公报中言明的，劫持人不许乌干达武装部队走近机场大楼。这是协商条件的一部分。虽然如此，一旦人质和劫持人来到机场大楼，经过进一步协商，他们许可由少数文职人员向人质提供医药、食品和其他福利设备，同时和劫持人继续进行协商。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大部分时间用在寻找具体协商方式上，一面等待劫持人表明他们的意愿。到了晚间，劫持人提议索马里驻乌干达大使以阿拉伯联盟国家大使团团长的身份作为他们的发言人。他们在当天并且向人质散发了调查表，要求提供国籍、职业和年龄等资料。直到晚间劫持人还没有宣布他们的要求。当日劫持人也接受了乌干达当局的要求，除了食品之外还对需要医药照顾的人质提供由一名医生和几名护士组成的医疗队。

六月三十日继医疗队的报告和阿明总统的不断要求之后，劫持人同意释放四十七名人质，其中包括老人、病人和一些儿童。劫持人就在当日首次发表了他们的要求。要求释放在以色列、德国、法国、瑞士和肯尼亚被监禁的人总计五十三名。这项要求分别送给索马里大使和乌干达当局，并由乌干达当局转达法国大使。



当时劫持人并且规定了七月一日东非时间下午二时（格林威治时间十一时）为新的最后限期，届时应将他们所要求释放的人运送到恩德培，以便交换人质。

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是劫持人为释放所称上述五国政府拘禁的五十三人而规定的头一个最后限期，阿明总统是日不但能够说服劫持人把这个限期延展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而且继续劝他们释放其余人质。

从劫持人得到的答复是：释放属于以色列以外国籍或是双重国籍的一百名人质，并将最后限期延展到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格林威治时间十一时，以便使劫持人获得他们的要求。可以看出直到此时，阿明总统在说服劫持人同意释放人质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对此事用了全部时间几乎没有睡眠。举例来说，他收到世界各领导人的电报，赞赏他的努力，法国总统在两天之内发送两份电报，对阿明总统为了释放人质所作的努力深表赞赏，并敦促他继续努力，使一切人质获释。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日，阿明总统必须前往毛里求斯主持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的开幕并把主席职位移交新主席。阿明总统在毛里求斯时充分利用这个机会就释放人质所作努力向他的同事报告。他在报告中呼吁各有关国家政府竭尽全力拯救其余人质的生命。他并且借此机会向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作了详细报告，并促请他也进行斡旋，使各有关国家政府注意此事的严重性和紧迫性。

由于国内难以处理的局势，阿明总统不得不缩短他在毛里求斯的停留，提早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三日返国。他返回后立即同各有关方面重新进行接触，其中包括人质，这是他在索马里大使面前向他们第三次讲话，再向他们保证为释放他们他将作出不懈的努力。是日早些时候，各人质曾对阿明总统为他们正在作出各种努力发出了感谢信，总统因特借此机会向他们致谢。

阿明总统几乎还没有安定下来，以色列入侵军就在这时在恩德培机场着陆。我国总统于七月四日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一时二十分向你发出了一份电报。主席先

生，正如你从电报中获悉的，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三架运输飞机突然并且没有得到乌干达政府任何许可就在恩德培国际机场降落。他们在着陆后不久就直向旧机场大楼前进，巴勒斯坦突击队在該大楼内拘留着人质和从特拉维夫向巴黎飞行时被劫持的法国大型客机机务人员。入侵军从飞机开出了两辆军用吉普车，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火箭炮以及炸药不加区别地袭击机场大楼和距离大楼约二百米按照劫持人规定的条件只有轻武器装备的乌干达守卫兵士。对大楼袭击的结果，入侵军打死七名劫持人、一些人质和乌干达兵士，并且打伤许多人。以色列入侵者还爆炸了旧机场终点大楼、炸毁了跑道、许多架乌干达飞机以及许多设备。

以色列的入侵有一些方面清楚地证明，不是没有得到几个其他国家的知晓、勾结和援助，便进行的，我愿意促请安理会对此加以注意。非洲不应容许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及其帝国主义头子或勾结者利用它的任何部分土地来袭击另一个姐妹国。根据我们得到的并经国际报刊证实的报道，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入侵恩德培的计划是本月初一在特拉维夫决定的。阿明总统说服劫持人延长他们提出的要求的截止期限以及能使劫持人释放更多人质也正是这一天。

乌干达代表团还获悉，以色列入侵恩德培必是被劫持飞机在乌干达降落的时候就已开始策划的。举例来说，应当注意的是以色列部队入侵之夜在恩德培着陆后一小时四十分的时候，美国之音就广播了任务完成的消息。这是在东非标准时上午二时（格林威治时间二十三时）广播的。通常在星期六午夜出版的英国星期日报刊也都详载了这个所谓恩德培军事行动成功的报导。

例如《星期日快报》在当天上午二时三十分的一版上兴高采烈地报导：

“今早以色列一位发言人在特拉维夫说：以色列一突击队今日救援了被拥护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劫持在乌干达恩德培机场的一切人质。发言人还说，法国航空公司机务人员也获得自由，在三架以色列飞机突击之后，爆炸震动了恩德培机场。”

我愿阐明乌干达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宽恕国际强盗行为。因此象以色列统治阶层所称乌干达同劫持人进行勾结是不正确的。乌干达政府出乎意外并且纯粹本着人道主义的考虑卷入了这个事件。这个劫持结局怎么在乌干达发生，法国飞机的机务人员也许更能够告诉我们。我们从报刊报导得知，这架法国飞机属于法国航空公司，飞行号数一三九，从特拉维夫起飞经过雅典飞往巴黎。飞机从雅典起飞后劫持人开始管制并迫使它在班加西降落加油，然后再从那里起飞。该飞机请求在喀土穆着陆被拒绝，这可能是它只有十五分钟的燃料供给而在恩德培停下来的原因。从此事可以推断劫持人本要飞往喀土穆。

乌干达对一切人质尽可能给予协助和优待。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帝国主义的工具——对这个人道主义态度的报答，则是入侵乌干达、再次表明它的野蛮和匪盗行为。通过对乌干达赤裸裸的侵略行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杀害了力图保护人质的乌干达人，并对乌干达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害。

这是本组织令人尊敬的会员国吗？乌干达在许多国际论坛上曾就以色列为联合国会员国的问题一再表明它的意见，最后一次就是阿明总统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发言。

我们要求安理会无保留并且尽可能强烈地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主权共和国进行野蛮、没有招惹和无缘无故的侵略。乌干达对以色列入侵时所引起的生命和财产损害要求充分的赔偿。我国当局正在详细拟定对这些损害的赔偿要求。

我只能希望其他非洲国家没有一个在这个卑鄙的事件上受到任何嫌疑的沾污，因为否则那就是说整个非洲大陆上谁都不能信任或是不支持非洲统一的理想了。这个统一是由我们非洲兄弟全体的思想和血汗结成的。我们今天不可怀疑甚至不可猜疑。

我愿在讲完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时代表阿明总统、乌干达政府和全体人民向所有那些国家和组织，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自从乌干达无辜人民遭受毫无理由的侵略以来所发送的表示慰问、团结和支持的电报，我们对此非常赞赏并表示感谢。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是毛里塔尼亚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哈桑先生（毛里塔尼亚）：主席先生，在这个辩论中我代表联合国非洲国家集团发言。我首先要祝贺阁下担任安理会的主席，我要说在我们集团中，大家感到多么高兴能够见到一个象你这样有才干有经验的人，在这样困难和悲剧性的情况下主持安理会的工作。我也要感谢你 and 安理会其他理事听从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非洲集团的要求，召开了安理会这次会议。

在我进入正题之前，我要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委员朱德的逝世，向中国代表团表示我们的悼念。朱德是全世界闻名的，在人民的自由和解放的运动中他的确发挥了重要的历史性作用。我们希望在座的中国代表团接受我们最深切的悼念。

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当然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它的确是伟大的美国人民的一个欢乐的节庆。但对乌干达人民和政府，实际上，对整个非洲而言，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是一个悲伤惊恐的日子——悲伤惊恐并不是因为丧失了什么人，也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天灾，而是因为以色列公然侵犯了乌干达共和国，乌干达政府曾尽一切努力去救助那些几乎注定要死亡的无辜人们。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以色列军队的若干单位，瞒过了国际舆论，辜负了踏经国家的诚意，也辜负了乌干达政府的诚意，降落在恩德培机场上制造死亡与毁灭。

若干乌干达平民和士兵无缘无故地被杀。乌干达政府和人民遭到相当重大的物质损失。安理会对于这一侵略行动及其所造成的人与物的后果，是很熟悉的；主席先生，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你和安理会理事国，乌干达外交部长在刚才所作的清楚谈话中，也有交待。所以我不需要重复细节。

特拉维夫当局对于进行这个冒险行动的借口是要救出被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或亲巴勒斯坦人扣作人质的以色列公民。但人人都知道，为了解决乌干达政府并

无责任的这个问题，当时不但许多国家的政府和联合国秘书长正在尽力，而且乌干达政府本身也正在尽力。人人也都知道，所谓的巴勒斯坦人或亲巴勒斯坦人的这个行动，是没有人赞成的，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也不赞成。此外，人人也都知道被认为这些人所属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这方面采取的态度。

但以色列政府公然蔑视国际社会，欺骗了国际舆论，宁愿以执法者自居，擅下毒手。该政府决定尽其所能救出无辜的人们，这个事实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它竟然去攻击一个竭尽一切能力而且仍在竭力阻止悲剧——老天爷，这种悲剧近来实在太常发生了——的一个小国，这个态度我认为没有一个是重信义的国家能够忍受的。特拉维夫当局对乌干达共和国的暴行的后果，其严重性足可令安理会加以谴责而有余。

但这些后果，尽管是多么严重，都不是促使非洲国家首脑在上次非洲统一组织首脑会议中表示惊恐的唯一原因。事实是这个行动本身的严重性，特别是它所开创的危险先例，促使非洲的最高领导人谴责以色列并要求召开这次安全理事会的会议，以便安理会也能采取同样的立场。

以色列政府似乎想要把这种行动说成是国家的常规作法，这样一来，没有任何国家，当然更没有任何非洲国家可保安全，不受这样的行动之害。以色列由于采取我们现在处理的这个行动，侵犯了一个联合国会员国和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的主权与独立。按照第3314(XXIX)号决议附件第一条所下的定义，这就是侵略行为。该条规定：

“侵略是指一个国家使用武力侵犯另一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以……与联合国宪章不符的任何其他方式使用武力。”

现在，事情很明显，以色列用了武力侵犯了乌干达的主权与领土完全。

这个侵略行动也明显地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特别是该条第4款。

我想事实是很清楚的。国际法受到了蔑视，安理会的任务是要确保联合国所

有会员国都享有联合国《宪章》所保证的权利。

特拉维夫当局发动的冒险行动，现在有人对我们声称，是一个独特的政治和军事行动，因而值得喝采。然而，如果我们撇开这次冒险行动的技术方面不论，就很容易发现这是一些几乎无法无天的人干出来的事，这种事真是属于儿童的世界。这个冒险行动不只是可能给所有那些以色列要营救的人质带来灾难，并且我们相信，它也使得将来若是发生同样的悲剧时和平解决更加困难。实际上，很明显的，那些令人遗憾的去干劫机扣押人质之事的人必将由此得一结论，而这个结论是绝不会对无辜的人有利的。今后也就无法阻止劫机者进行他们的威胁行为，因为和他们进行谈判无论如何是要冒着生命的危险的。因此，以色列冒险行动对无辜的人来说是没有好处的，也许有一天，无辜的人会不幸地发觉他们被一些时常是无责任感的亡命之徒掳为人质。

一个为了人道的理由，同意接受一架被劫的飞机以保全无辜人士的生命，但因此却遭到以色列干的那种侵略的国家，究竟会采取什么态度，这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现在我们暂且假设——这很可能发生，也许就会在将来发生——法航的大型客机不是被劫持到乌干达，而是被劫持到譬如美国、法国、比利时或联合王国。当那些国家不但主权受到侵犯，而且军民也被杀死的时候，它们会袖手不动一动吗？我们相信答案必然是否定的，那些国家的舆论必定会一致地谴责以色列的侵略。

但因为我们在这里处理的是一个第三世界国家，一个非洲国家，所以也就有人不顾逻辑与常识，赶忙去宣告胜利，大肆吹捧，甚至去祝贺。实际上看来，却是在为弱肉强食的法律进入国际关系中而喝采。看来有人欣见无政府状态的互相残杀变成国与国关系上的一种制度。

劫机和其他形式的暴行确实是存在的。这是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反映出那些被逐出家园的人们，那些尊严受到蹂躏的人们，以及那些基本人权被剥夺的人们的痛苦绝望，但没有人能够赞成这种暴行方式，更不用说

它的后果了。这是一种不可预知的暴行方式，因为它是一些难以控制的人们的行为。国际社会绝对有权关切这种暴行方式，并谋求消除它的起因以便除去造成暴行的理由。

但是，一些无法控制的人不幸挺身走险，犯下的那种暴行，若被一个政府把它制度化，不但公开承担暴行的责任而且甚至以其为国家荣耀的基础，这样一来它就成为严重凶蛮的暴行了。特拉维夫当局侵犯乌干达共和国的行为是一种新式的，无比地更加危险的暴行，因为它是有组织的权力机构的工作，更何况这个权力机构还是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以色列要把弱肉强食的法律带到国际关系中——如果你们安理会理事国不向以色列清楚而不含糊地表示你们的异议，它很可能会成功的。

总的来说，在我看来，安理会有义务保证国际法受到尊重，保证本组织所有会员国的《宪章》所承认的权利——特别是本组织内的弱国，它们的国防只是寄托于它们的合法权力和它们在本组织里的发言权。

乌干达共和国是被侵略的受害者；它的主权和独立受到了侵犯。乌干达和整个非洲一样，期望你们安理会理事国毫不含糊地谴责这个侵犯乌干达主权的行；它期望你们为它所遭受的物质损失，要求公平的赔偿。如果很不幸，安理会不能担负起这个责任的话，这个组织存在的理由就要动摇了。

主席：谢谢毛里塔尼亚代表对我个人说的客气话。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首先让我向你表达我国代表团对你担任安理会主席的最良好的祝愿，并对你可以裨益安理会的审议工作的丰富经验和才能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天假其便，罗马的子民在此主持会议。“我是罗马公民”这个原则是当年在罗马宣布的。当一个国家宣布保护其海外国民时，即引用这个原则。

从纯形式的观点来看，这次会议的召开是因为以色列政府受到了控诉。然而，我要明白表示，我有幸作为以色列政府的代表坐在此处，我决不是坐在被告席上受审。相反地，我站在此处，代表世界上堂堂正正自由的人民作一个原告。

我站在此处，控告邪恶的力量掀起抢劫和恐怖的浪潮，威胁着人类社会的根本。

我站在此处控告所有这些邪恶力量，天生胆小卑鄙，把不相干的旅客，无辜的妇女与儿童——是的，甚至襁褓中的婴儿——视作邪恶用心的合法目标。

我站在此处控告某些国家，不存好心，没有骨气，与那些嗜血的恐怖主义者的勾结合作。

我站在此处控告世界上的某些当政者；幸灾乐祸，暗地协助恐怖主义。

我站在此处控告这个世界组织，联合国，中了阿拉伯代表及其同党的诡计，不能协调有效措施，打击世界恐怖主义的恶行。

我站在此处控告本组织的有些代表团，基于政治理由，对这问题默不作声——这问题终必会波及本组织的每一个国家。他们这样作，本身就变成同谋。

开明世界舆论所指控的，今天坐在被告席上受审的是恐怖主义的组织；它们正在为害世界，而世界组织却让它们的代表过去在这里与其他会员国平起平坐。受审的是所有那些勾结、协助、煽动恐怖分子的国家。站在这儿当被告的是那些国家：它们阻挠每一次针对为害世界的恐怖死症的国际行动。

站在我们之前受审的所有这些国家——它们为数太多——受到恐怖分子害处时就哭声震天，公民或外交官受到威胁时就在安全理事会议席上暴跳如雷，同样事情



发生到其他国民身上时就保持缄默。其中某些国家甚至连保持缄默的虚假礼貌也没有；它们厚颜无耻参加谴责立意阻止这些行动的国家。

站在我们之前受审的是所有这些国家的代表，他们在大会堂里起立鼓掌迎接一名携枪的恐怖分子；据苏丹总统说，就是这个恐怖分子在一九七三年三月一日亲自下令处死喀土穆的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地下室内被绑了手脚的美国和比利时的外交人员。

是的，站在我们面前的被告正是这个下流、龌龊、野蛮、玩世不恭、嗜血如狂的国际恐怖主义的魔鬼，和那些明的或暗的支持它的国家。今天同他们对立的是全世界普通的善良民众，所求不过是过一种没有恐怖和恫吓，没有劫机威胁，没有恐怖分子的不分皂白的炸弹，没有罪犯及凶手的勒索的生活。

以色列在恩德培拯救人质的行动赢得了全世界浪潮般的支持和赞扬，从各大洲，包括非洲；从各行各业；从以色列的敌国和友国而来的这些支持和赞扬是难得见到的。普通的老百姓都起来支持我们对这个恐怖幽灵大呼“够了”对这充满了自以为是的的外交人员的世界组织大呼“够了”，在这世界组织中有多少次，因为道德上的怯懦加上幸灾乐祸的态度才使事情愈陷愈深。

今天，不止在一个意义上，本组织是站在被告席上。人类将就它在这件事上的作为来判断它，因为问题从没有今天这样明白；从没有今天这样是非分明。假如恐怖主义不受到谴责，则本组织及其会员国是不会为历史饶恕的。本组织所面对的问题不是以色列在恩德培机场的行动；本组织所面对的问题是它自己在历史眼中的前途。

乌干达的代表很轻易的躲开了我们面前的这个主要问题。让我追述事情发生的经过吧。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星期日，一架经由特拉维夫前往巴黎的法国航空公司的空中巴士，航号一三九，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的一群恐怖分子劫持了，机上有无辜乘客二百五十六人，工作人员十二人。

恐怖分子乘雅典机场安全措施松弛，将手枪及将近二十颗手榴弹带上飞机。

这样，就开始了由组成巴解的数个恐怖分子团体之一，巴勒斯坦人民解放阵线所周详计划细密执行的劫机行动。这样就开始了巴解一长串为害平民罪行的清单上的另一件罪行。

劫机犯劫持了飞机之后就迫使法国驾驶员降落到利比亚，这个国家现在已经国际公认是这种罪犯的第一个避难所。

大家应记得，这地方是去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部长们在奥地利被劫持飞行的第一个停留站。安理会应记得，劫机犯用枪尖指着利比亚也是成员之一的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部长们；利比亚的贾卢德总理却热情洋溢地欢迎他们，拥抱他们，而罪犯们当时正把他的阿拉伯部长同事劫作人质，并且前一天在维也纳杀了一位利比亚代表团的团员。

在我们所谈的这种事件中，上星期这位总理倒没有欢迎劫机犯。由我们苏丹同事向安理会所提的控诉来判断，他显然是专心一意准备在苏丹搅利比亚支持的政变。所有这些，再加上他专心一意把所谓利比亚维持和平部队引进贝鲁特，以煽起仇恨的火焰，扩大屠杀的范围、加深黎巴嫩人口中基督教徒的危险处境。

既然提到了利比亚，我想请大家注意这个国家在今天世界上助长和鼓励国际恐怖的中心地位。

这个国家多年来担任着全世界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的国际恐怖运动的军需官。

这个国家前不久因为它的恐怖行动，因为它在策划暗杀苏丹和突尼斯两国的领导人和推翻两国政府这件事中所扮演的阴险角色，受到两国的谴责。

这个国家因为从事颠覆活动它的大使几天前被埃及政府驱逐出境。

安全理事会的目标是要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维持，而这个世界恐怖主义的后台老板的代表竟坐在安理会的会议厅中当理事国，我认为这个世界组织之耻。

言归正传，法航的飞机在班加西加油。劫机犯的目的地依照预定计划是乌干

达坎帕拉城外的恩德培机场。

空中巴士于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一降落恩德培机场，劫机犯又获得了一批恐怖分子的增援，这批恐怖分子身携冲锋枪，炸药早就全副武装地在机场等候着。

乌干达的伊迪·阿明总统到机场比劫持的飞机还早一点，他拥抱劫持犯，表示欢迎并应允支持和协助。乌干达的军队立即布岗，不把他们的枪瞄准劫持犯，而瞄准无辜的百姓——男人女人和儿童。

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二，劫持犯开出了他们的要求。其中包括在七月一日星期四，当地时间下午三时之前释放关在以色列、西德、法国、瑞士和肯尼亚的五十三名恐怖分子。若他们的条件不被接受，他们威胁说要将无辜的乘客处死。

当劫机犯于六月三十日星期三释放了四十七名妇女、儿童和一些乘客时，阿明总统事实上是披着欺骗和虚伪的外衣而暗地里与恐怖分子勾结的真相已逐渐暴露。这就是七月一日夜晚，恐怖分子所定的第一个期限到来时的事态。明显的是，以色列的男女儿童乘客的生命是处于极严重的危险状态中。

劫持犯再释放一百名人质，这些人在抵达巴黎时所透露的实情显示形势险恶。他们向等候在机场的记者们描述，乌干达的士兵如何在阿明总统的直接命令之下监督隔离犹太乘客和非犹太乘客。

这种事态十分险恶，容易勾起往事的回忆，无论以色列国内外没有一个犹太人会轻易忘记其可怖的含意的。

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马上闪过在人类所见的，对我们民族的最可怖的大屠杀中那种令人心胆俱落的回忆。我们记得纳粹在集中营里把犹太人拉出来，送到瓦斯室去消灭。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大屠杀的永不忘怀的事件之后，犹太民族的每一个人不管当时在场与否，都有意无意立了一个誓愿，决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决不再让环境演变得这种大灾难足以发生；决不再让属于历史遗迹的奥施维茨、达绍、布兴瓦

尔德又重新回到世上。

借这个机会，我向本组织庄严地重申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所立的誓愿，决不再让这种事情发生。

因此，当这个令人勾起可怖回忆的认人行动开始，犹太人被分开隔离时，以色列政府除从事拯救活动，救出其公民生命之外，很显然已没有其他办法。

知悉阿明总统对犹太民族的态度，以色列政府的忧虑又更加深。一九七二年九月，阿明总统曾发了一个电报给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电报于同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并将副本分送以色列总理和巴解首领亚西尔·阿拉法特，在那个电报中，阿明总统对以色列运动员在慕尼黑世运会中被巴解手脚捆绑——枪杀的事大加喝采。而且，他还穷凶极恶，赞美希特勒消灭六百多万犹太人。

安理会理事国谅必记得，九个月前，阿明总统曾在联合国大会上主张消灭以色列国。以色列和犹太乘客从其他乘客中分开隔离，乌干达总统正式推崇希特勒的政策，他主张消灭以色列，数十万他自己的国民只因为他不喜欢他们就落入悲惨的命运——关于这一点，我请理事国参考肯尼亚政府于七月七日发表的关于“乌干达的法西斯独裁统治者”所干的各种暴行——所有这些加起来，使以色列政府深切地了解了，若不采取行动，那些人质，男人女人儿童，只有死路一条，在恩德培得不到怜悯。

这些劫机犯，谋杀犯和他们的乌干达同谋的邪恶和疯狂意念，在被劫持到最后一刻的人质中有十一个小孩和三十四位妇女必然会被嗜血的谋杀犯冷酷地枪杀，还有比这更险恶的迹象吗？

那里，在国际恐怖主义和阿明总统的枪尖监视之下，人质们在临近死亡的阴影里办了一个幼儿园。这一可悲的景象是令人感到大难临头的。这与这些强盗的作风是多么相称。他们在那里准备射杀一群无辜的儿童。他们的同党几个月以前在索马里就干过这样的事情——此处的法国大使告诉我们的——威胁着要割破从六岁到十二岁的三十名法国儿童人质的喉咙。

在这一点上，我且引拉宾总理七月四日在以色列国会的声明：

“最后通牒的期限愈来愈迫切。以色列籍以外的乘客释放了，这就愈来愈暴露了对以色列公民的邪恶阴谋。政治努力已得不出结果。沙漏的沙已快漏完，任何独立的拯救工作已不可能。在这些条件之下，以色列政府一致决定采取唯一可行的办法拯救我们的人，宣布准备释放关在以色列监狱中的恐怖分子。内阁决定之后，我们就通知了居间与恐怖分子谈判的法国政府。我们已经准备在别无办法之下采取这种办法去拯救我们的人。这不是一种拖延时间的策略，假如，还有这个选择的话，我们就会坚守我们的决定，作为最后一着的。”

劫机犯提高了他们的要求。他们宣布，凡是他们所要求释放的恐怖分子，包括不是关在以色列的那些恐怖分子，都要以色列负责，而且他们不准在法国或乌干达以外的中立领土上交换人质。他们恶毒的口吻和新的要求预示了人质的噩运，这样，以色列政府无路可走了。

一九七六年七月三——四日的夜里，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一次杰出的将流芳千古的军事行动，救出了人质，把他们护送至安全地带。

我要借此机会重申，以色列对此行动完全并单独负责，没有任何别国政府在什么时候曾参与计划或执行这个行动。这行动是由以色列策划的，执行的。我们以此自豪。

在拯救行动进行中，恐怖分子杀了三名人质，这些恐怖分子随即为以色列军击毙。一名以色列高级军官遇害，是从背后射杀的；有几名士兵和人质受了伤。

我们的证据显示乌干达政府对整个事件是预先知情和串通的。即便没有这些证据的话——我说证据随处都是——读读阿明总统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给主席先生的信(S/12124, Annex)也就够了，在他自己的陈述中显示出他是参与其事的。在他的信中很明显地看出，乌干达的军队不是看守恐怖分子和劫机犯，而是看守人质他在信中的第四段说：“我下令飞机应妥当看守。”他又接着说了这最不

可思议的话：“……劫机者不准乌干达武装部队走近机场建筑物。”人人都知这是假话。建筑物的里面和四周都有乌干达的军队。

在叙述六月三十日和七月一日释放一百四十七名人质的经过时,他又暴露了自己参与其事而公开承认他帮忙隔开以色列乘客和其他乘客。我们也从他这封信中获悉索马里驻乌干达大使所担任的邪恶角色,他代表的国家已成为那个地区的主要捣乱分子,是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吉布提地区等邻邦的威胁;几个月前它还参与劫持三十个法国儿童人质,那时法国政府,也象以色列政府这次一样同仇敌忾,采取了武装行动,依据国际法行使其权利,从索马里手中救出了儿童。

恩德培机场的恐怖分子之中有一个是索马里巴解办事处的头目,绝非巧合。

整个事件,乌干达政府从头至尾都有勾结。我仅列出法航工作人员和释放的人质所追述的事实的一小部分。

关于事前的参与,

- (a) 法航机长说,德籍劫机犯维尔弗雷德·伯泽事先知道恩德培是飞机的目的地。
- (b) 飞机降落恩德培时,德籍女劫机犯大声说,“一切都好;军队已到了机场”
- (c) 伯泽向乘客宣布,只要着地就到了安全地方。
- (d) 到达之后,乌干达军队立即包围了飞机。他们带来了五名武装的阿拉伯恐怖分子,这些恐怖分子与飞机上的劫机犯拥抱亲嘴。之后,恐怖分子的增援人员参加了防守和谈判。
- (e) 在降落之前,还在空中,劫机犯就告诉乘客,等一会有汽车来接。
- (f) 乘客集中在机场的大厅之后,有人看到阿明总统与劫机犯拥抱握手。
- (g) 飞机降落滑入跑道时,一辆默西迪斯车驶来,两名恐怖分子下车,其中一人就开始指挥其后的行动。他上了飞机,与德籍劫机犯伯泽拥抱,交谈。
- (h) 担任乘客和劫机犯中间人的一家法国公司的经理米歇尔·库若报告说,机场主任送补给品给人质时,说他奉命准备大约二百六十名乘客及飞机工作人员的补

礼品。

关于拘留劫持的乘客，

(a) 最初的二十四小时中，看守的责任是由乌干达军队担负，劫机犯连影子都没见到。劫持犯精神饱满回来后，乌干达的军队交给他们冲锋枪来看守劫持的乘客。我必须在此提及乌干达外交部长说劫机犯配备了冲锋枪。他略而不提的是在飞机上他们只有手枪和手榴弹而已。冲锋枪是他们降落恩德培之后由乌干达军队供应的。

(b) 以后几天，乌干达士兵在建筑物外面看守，但是有一大批士兵驻在建筑物的二楼。

(c) 人质上厕所，一律由乌干达士兵陪着和看守。

(d) 劫机犯来去自由，有两辆汽车供他们使用，由乌干达司机驾驶，其中一名乌干达司机穿着制服。

(e) 劫机犯在机场得到后勤援助和冲锋枪，手枪，炸药等武器供应。他们也得到了一架流动的通讯装备。

(f) 指挥恩德培行动的那个恐怖分子将人质拉在一边，在乌干达士兵警卫之下，进行盘问。

(g) 阿明总统每次出现机场地区和乘客面前时，都要跟恐怖分子密谈一番，十分热和。

(h) 在谈判开始时，阿明总统即支开法国大使，不让法国大使与恐怖分子接触。他自己同恐怖分子接触。

(i) 阿明总统警告劫持的乘客不要妄想逃跑。

(j) 显然是为了虚张声势和吓唬劫持的乘客，两架喷气机时常在拘留乘客的机场上空飞来飞去。接近建筑物的地方停了一辆装甲车，配备了重机枪。另有两架直升机停在附近。

(k) 劫机犯和乌干达士兵联合看守人质；他们之间接触频繁而随便。乌干达士兵在大厅、机场大厅三楼及飞机上等处站岗。

(1) 劫机犯在地面上这段期间无忧无虑状至轻松。他们时常离开机场大厅，显然相信乌干达军队不会想来制服他们。伦敦市政府的官员，从劫持的法航空巴士释放的英国人之一，托尼·拉塞尔先生在七月五日接受《伦敦时报》访问时说阿明总统假如愿意是可以将全部人质释放的“我们一下了飞机，”他说，“恐怖分子就失掉了指挥权。我有个感觉，我们被移到机场大厅之后，假如阿明要释放我们，那是可以做得到的。恐怖份子们已经三十个小时没睡觉，手中也没有强火力的武器。”

(m) 恩德培劫机犯的头子始终跟阿明总统在一起，这是阿明打电话给在以色列的巴列夫上校时偶然提及的。

(n) 当乘客们被劫持的时候，乌干达电话播送了劫机犯的声明，赞美阿明反犹太复国主义及帝国主义的立场。

(o) 最后，劫机犯与乌干达的士兵一起用隆重军礼下葬。

乌干达与巴解保持密切关系，巴解有许多人在乌干达。巴解在坎帕拉的办事处，在哈立德·谢赫指挥之下，统筹在东非的宣传活动。乔治·哈巴什统率的人民阵线，在坎帕拉没有情报处，负责该组织在全非洲的活动。该处听人民阵线海外恐怖出击支部的头子瓦迪亚·哈达德的指挥。数百巴勒斯坦人在乌干达政府及公用事业担任行政职务，取代被该国驱逐的亚洲人。

乌干达和巴解在军事方面也维持了密切合作。乌干达有巴勒斯坦人的军事训练中心。巴勒斯坦的飞行员由乌干达的空军训练驾驶米格21机。阿明总统的侍卫中也有巴解分子。

乌干达勾结的程度可在飞机降落恩德培之后坎帕拉电台英语新闻广播中测出。这些广播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监听报告中有记载。

假如代表们肯去读这些报告，就可以看出来乌干达当局同劫机犯的目的和要求是完全一致的。



他们在广播中并不想隐藏对劫机事件欣喜若狂以及乌干达政府同劫机犯打成一片的一种气氛。

因此，六月二十九日那天兴高采烈的广播是这样开头的：

“现在是你们所期待的特别报告。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提出了以下的要求”。播音员接着宣读了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发表的六点声明。

要证明无论是按自然法和国际法的准则，以色列采取的行动都是完全正当的行为，并不真正需要所有这些证据。从这件事的事实来看，任何人必定会作出以下两个结论中的一个：或则是乌干达政府直接参与扣留无辜乘客、男人、妇女和儿童为人质，或则是乌干达政府并未在其领土上行使主权，没有能力应付六个恐怖分子。

到今天为止，乌干达政府还没有释放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多拉·布洛克女士。她是要到美国来参加儿子的婚礼，遇到劫机。还有什么比这项事实更好的证据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看法的呢？此外，在劫机犯被歼灭以后，乌干达政府拒绝立即释放法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也只能证实其串通勾结的事实。

有什么其他理由可以使乌干达政府违反其所签署的一九七〇年《海牙公约》，而拒绝把飞机交还给法国政府？

如果乌干达政府与这次的罪行无关，为什么不在劫机犯被歼灭以后立即释放七十五岁的老太太布洛克女士？为什么她会由警卫看管在坎帕拉的医院中？

在营救行动以后，英国领事于七月四日去看她时，为什么不将她交给英国领事？为什么突然不怀好意地通知我们说乌干达当局——据报四名政府人员从医院把她拖走，她大叫起来——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

乌干达政府如果行使国家主权，就知道她在何处，否则就是不行使主权。

我要问那些谴责以色列行使其固有自卫权的同事们、非洲人和其他人，你们要

不要宽恕阿明总统对七十五岁的多拉·布洛克女士所作的这种“骑士”行为反映出来的可怕行径？

就这么一次，鼓起勇气去做你认为应当做的事，把话说出来，要不然就让本身的沈默谴责自己。

在这里，你们有一个清楚而简单的案件，对全世界的高尚人士没有解答也不可能有任何解答。

在这里，你们见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怪现象，那就是一个国家在对一个七十五岁的老妇人作战，推想还得到这种卑鄙、懦弱的行为一鼻孔出气的那些人的支持。如果乌干达政府没有卷入这件事的话，让它现在就立刻把布洛克女士亮出来。

安理会是不是想仍然对布洛克女士的命运保持沈默？

这个老妇人的失踪，以及到目前为止已为人所熟知的在阿明的乌干达境内发生的许多恐怖事件，已充分证明促成以色列政府采取行动的预感是对的。

这种行动在本质上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国际法中已有相当详细的规定。毫无疑问，国际法和先例是完全有利于以色列的。但是，以色列在恩德培的行动提醒我们，在法令典籍中的法律并不是人类唯一的法律。另外还有一种道德律。根据这个地球上的道德标准，以色列完全有权做出它所做的事。实际上，它也有义务这样做。

乌干达违反了国际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没有保护在它领土上的外国国民。此外，它的行为也是公然违反一九七〇年在海牙签署的《取缔非法劫持飞机公约》。这项《公约》曾经以色列和乌干达批准。《公约》第六条规定：

“任何缔约国对于其领域内的罪犯或嫌疑犯，于确定情况有需要时应予扣留，或采取其他措施使其不致逃脱。无论拘留或其他措施，均按照该国法律

规定办理，但以进行追诉或引渡所必需的时间为限。”

第九条规定：

一、第一条第一款所述行为发生或行将发生时，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恢复或维护合法机长对飞机的控制。

二、发生前项所述情事时，飞机、乘客或机员所在地的缔约国应给予便利，使乘客和机员能尽速继续飞行，并将飞机或货载立即发还给合法所有人。”

所有国际法的权威均承认一国有权采取军事行动保护其遭受生命危险的国民。

鲍特教授在《国际法中的自卫》一书第八十七页上说：

“法理学家的著作和各国的惯例均承认一国有权进行干涉，以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保护其在他国领土内受伤的国民。仲裁委员会报告员休伯法官在一九二五年大不列颠和西班牙之间的仲裁案中——即大家所知的对西属摩洛哥的权利主张的一系列事件之一——说：

“但是，无可否认的，在某一点上，尽管没有正式的规定，一个国家保护其国民和他们的财产的利益是可以超越领土主权的。所有国家都主张过这种干涉权。有所争论的只不过是这种权利的范围而已。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保护国采取了一项行动，它显而易见地侵犯了领土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不可侵犯性。只要这项行动实际上贬低了领土国家主权，它在性质上必须是例外，而且以没有其他保护方法的情况为限。它的先决条件是：任何其他保护方法均不足以防止保护国的国民或他们的财产受到实际的或将来的损害，和因领土国及其当局的行为，或因领土国无法或不愿防止的个人或一群个人的行为而产生的损害！”布赖尔利在《万国法》第六版第六二七页中说：“因法律和秩序的破坏而派遣部队登陆以解救受死亡或严重伤害紧急威胁的国民的生命，是否属于正当行为，是一个很微妙的问题。这种形式的干涉，在过去并不是少有，

同时只要不致被怀疑成政治压力的借口，由于绝对必要采取立即的行动以解救当地政府无法或不愿保护的无辜国民的生命，这种干涉一般都认为正当的。”

他继续说：

“必须作出各种努力以使联合国采取行动。但是如果联合国不能及时行动而又明显需要采取立即行动时，就很难否定保护国民的行动的合法性了。每一个负责的政府如果有办法的话，一定是会采取这种保护国民的行动的。当然，其基础是：这项行动必须严格限于安全救出受威胁的国民。”

奥康内尔在《国际法》第二版第三〇三页中支持这项论点，他说：

“传统的国际法并不禁止各国保护其生命或财产受他国政治情况危害的国民，如果派人保护他们的行动是与局势相称的话。在哈瓦那召开的第六届美洲国家国际会议试图于一九二八年制定一项关于干涉的法律观念时，美国指出必须明确规定干涉的定义，因为美国不会袖手旁观地容许一国政府崩溃瓦解，使发生革命的国家境内的美国侨民的生命和财产受到危险。美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的暂时性质的干预并不是不合法的。”

作者继续说：

“《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应解释为不得使用武力行为侵害各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但是当《联合国宪章》所设想的机构无法有效应付局面时，并不禁止使用武力，这种武力的使用其立意和效果只是保护一国本身的主权及其国民的重大利益。”

劫机行为足可视为海盗行为的一种。早在中古时的国际法初期，海盗即已是人类的公敌。在对贩卖奴隶和海盗行为作战期间，曾在国际法中确立了某些规范，容许对在非洲和美洲之间从事贩卖奴隶的船只和对北美洲的海盗中心进行干涉。国

家主权的原则向人类自由的更高原则低头。

在这方面，在此作一回顾可能是适当的，那就是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建立是为了对海盗作战。同时不可不注意的是海军陆战队的队歌中提到了“的黎波里的海岸”。显然的，那个海岸是恐怖分子的避风港并不是一件新的事——当年是海盗和船只的避风港，今天则是劫机犯的避风港。

以色列在恩德培的行动同那个时代的人道救援行动非常类似。当时贩卖奴隶的人可能声称搜查奴隶船是违背国际法。但是文明人确订出了一种更高的法律，即人类自由的法律。没有人可以主张国家主权凌驾于人类自由之上。

如果犹太国在三十年代就存在的话，随着纳粹主义的兴起，我们也可能会决定努力采取一次行动，营救集中营内的囚徒。按照今天批评我们的那些人的逻辑，这样做就是公然侵犯第三帝国的主权了。到底什么更重要：希特勒的主权或是从一场大屠杀中救出无辜的人民？

请容我回顾一下一九七〇年大会第2645(XXV)号决议，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日S/10705号文件中安理会关于劫持飞机问题的共同意见，一九七〇年欧洲理事会大会谴责巴勒斯坦组织运用某些阿拉伯国家为避难所、训练场和行动基地以劫持飞机、进行破坏、扣留人质和勒索各国政府的决议。

我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些决议和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的有关决议，为的是提醒安理会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是至今却还没有采取实际有效的步骤去对付它。

全世界都在为制止恐怖的问题伤脑筋。因此，苏联于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公布了一项关于劫持飞机的犯罪责任的新法律。伊瓦诺夫于一九七三年一月十六日的《消息报》上详细讨论了这项法律。实际上，苏联官方的日益关心，在苏联的科学和法律杂志以及在一系列的官方行动中均有明显的表示。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四日的《真理报》对海牙举行的国际民航组织会议制订关于防止劫持飞机的新公约一事有赞赏性的报道。一九七〇年十一月，《真理报》发表了赫列斯托夫的一篇文章，赞扬一九七〇年联合国大会第2645(XXV)号决议。一九七一年一月十六日的《消息报》上又有赫列斯托夫的一篇文章，赞扬一九七〇年的《海牙公约》。

我也请安理会注意一九七一年十一月八日在莫斯科出版的《国际事务》中，耶夫塞耶夫和科洛索夫所写的《取缔空中强盗》的一篇文章，其中讨论到了联合国大会第2645(XXV)号决议和一九七〇年的《海牙公约》。同时我要提醒苏联代表一下，这篇文章对该决议和《公约》是支持的。

自卫权在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中均有规定，如同著名的卡罗琳案一样，可根据代表性的成例加以援用，只要：

“有即时压倒性的自卫必要，别无其他选择和没有考虑的时间”，即可容许自卫行动”。

这正是以色列政府当时所面临的局面。

在同样的环境下，其他国家曾经采取了同以色列一样的态度。就在几个月前，安理会曾讨论法国为解救一车扣留在在索马里边境作为人质的30名儿童所采取的行动。我要向安理会提一下法国代表于一九七六年二月十八日向安全理事会所说的话。

法国代表是向安全理事会报告一次意外事件，起因是索马里境内的一批恐怖分子扣留了一辆校车内30名6至12岁的法国儿童作为人质。索马里的这些恐怖分子的代表向法国政府提出了要求，如果不满足他们的要求，就要割破这些儿童的喉咙。法国部队因此在索马里边境对恐怖分子采取了行动，把他们杀死；在这过程中，一名儿童被恐怖分子杀死，另有五名受了伤。当法国士兵冲向前去营救儿童时，从索马里边防站有人朝他们开火，一名法国中尉受了重伤。法国部队很自

然地是朝索马里领土回击,使索马里人有了伤亡和损失。在这次事件中,也有一名人质下落不明,随后这名儿童被发现是恐怖分子扣留在索马里境内。后来,幸运地回到了家里。

这场辩论对安理会理事国来说是很熟悉的。但是,只要说法国明确驳斥了在这方面对它的侵略指控就够了。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我们在恩德培所处的一种局势下,法国在那个场合中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正当地尽了它的责任。

在去年的马雅圭斯号事件中,美国营救了商船和船员,福特总统当时说:

“使用武力的决定是百分之百地完全基于一点考虑:把船员和船弄回来。”

我可以继续提出好几十个案件来,向大家表明,依照国际先例和国际法,以色列的行动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凡是尊重自己的国家,在考虑到同样的行动为可行时,也会在类似的情况下采取同样的行动。

一九四〇年,载运一批英国商船船员战俘的德国船只阿尔马克号经由挪威领海驶往德国时,英国政府即强调这项原则。驱逐舰科萨克号率领的一支英国舰队于是进入了容许这艘德国船只通过的在当时是中立国的挪威的领海。而在一九四〇年,这些英国船员是根据战争法的规定被俘的。邱吉尔先生当时亲自授权英国军舰,如果该水域的挪威海军舰艇开火因而危及英国舰队时,即行回击。他为挪威的鱼雷艇问题向科萨克号的舰长维安下达了以下的命令:

“如果它朝你开火……你应当使用必要程度的武力来保卫你自己,它停火时,你也停火”。

邱吉尔爵士在他所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中阐明了当时指导他的原则:

“国内和内阁所重视的是船上有没有英国战俘……这是主要因素”。

在现在这个例子中,以色列政府所重视的是那些受到死亡威胁的人质的生命。

除了这一点人道的考虑外，并无其他考虑在推动着以色列政府。

以色列的营救行动并非针对着乌干达。以色列军队并不是攻击乌干达——当然也不是攻击非洲。他们是要从乌干达当局所援助和支助的一帮恐怖分子和绑匪手中营救他们的国民。他们所用的方法，正如国际法中所规定的，是实现这一目的最低需要的。

这正如个人有权利使用适当的方法保护自己，杀死要杀他的人。他不会被认为犯了谋杀罪。裁判要考虑到行为的情况和目的。同样的道理也适用在国际事务上使用武力。

这些年来，正如以色列同全世界许多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各国从事合作并继续合作一样，按照我们援助发展中国家的原则，也援助了乌干达。但是我们能提供给乌干达的援助是有限度的。一九七二年，阿明总统到以色列来，拿出一些地图说明他入侵坦桑尼亚的计划，要求以色列给予空中支援，包括轰炸达累斯萨拉姆。以色列对于这一荒谬而恶劣的提议的答复，使得阿明元帅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戏剧性的改变。以色列对于他的坦桑尼亚计划所表示的态度使他受到挫折，加上利比亚统治者对他的过度奉承，使得这位乌干达的统治者产生了极端的激烈的反犹太人、反以色列的态度。

如果一个人的感觉不因本组织某些行动的绝对矛盾而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的话，非洲统一组织向安全理事会提出这件控诉的行动就显得完全自相矛盾了。这次的讨论当然也不例外。

我要向我的非洲同事们回顾一下一九七〇年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的一项决议。

“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于一九七〇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六日在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贝巴召开了第十四届常会，



“听取了埃塞俄比亚外交部长就一再发生破坏和劫持民航飞机并因此危及乘客安全的事情所作的声明，

“认识到因这种国际空中旅行的犯罪行为而产生的不幸后果，

“ 1. 谴责所有劫持和破坏民航飞机的企图和行为；

“ 2. 要求所有国家采取严厉措施以保护民航飞行不致遭受危险；

“ 3. 呼吁所有国家逮捕和惩罚这类罪犯以确保国际空中旅行的安全。”

他们的态度怎能与他们都接受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相吻合？ 在此我们又犯了选择的毛病。 非统组织的成员国难道没有认识到，宽恕海盗和劫机行为，这类行为就会发生在它们自己的民航机上和它们自己的国境内？ 我们难道应当按照杀人犯或犯罪者所属的种族、肤色或大陆而将劫机行为、国际谋杀行为、海盗行为、野蛮行为和强盗行为作出选择性的分类？

我们犹太人对这种选择性行为以及这种行为为其从事者所带来的灾祸和厄运是太熟悉了。

在这方面，请容许我回顾一下，就在上个月安理会的讨论当中，我在答复苏联代表就恐怖行为问题所作出的发言时曾说，一位杰出的苏联外交部长，马克辛·李维诺夫，曾经说：“和平是不可分割的”。 当时我指出恐怖主义也是不可分割的。对恐怖主义你是没什么选择的。 世界各国不是携手把这种为害人类的瘟疫消灭掉，就要被这种瘟疫所消灭。

当灾祸降临到你头上时，光是怕得叫起来是不够的。 如果恐怖主是坏的，则在任何情形、任何场合下，不论是任何人干的，任何人受害，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坏的。 必须把它消灭掉。

我国总理于七月四日在以色列国会总结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那次大胆而富于想象

力的行动时说：

“在对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中，这一营救行动有极重要的成就。这是以色列对人类向国际恐怖行为进行的斗争所作的贡献，但是不可把它视为最后的篇章。当我们继续作出努力时，它将给予我们鼓励，但是斗争还没结束；新的努力、新的方法和不断变换花样将是我们所需要的。恐怖分子将会发现，我们既未丧失了机动性，也未墨守成规。”

在许多方面，这是本组织面对真理的一个时刻。如果它能勇敢地抓住这个机会，毫不畏缩地携起手来，为了全世界普通人民的利益，对国际恐怖主义作战，那么它就能符合当初设立的目的。它仍然可能稍微挽回一点因成为专制暴君和极端分子的人质而失去的威望和信誉。

一九七二年，在慕尼黑发生谋杀十一名以色列运动员的事情，促使秘书长要求大会设想各种措施，把世界上的恐怖主义瘟疫消除掉。阿拉伯国家和它的朋友，利用它们的“当然多数”，设法“埋葬”了这个议题。今天，国际恐怖主义的问题是由安全理事会处理，而不是由大会处理。

如果安理会不能抓住这个赐给它的机会，从我们当中消除掉恐怖分子、绑匪、劫机犯和勒索犯的祸患，那么在人类的心目中它将陷于最不值的地位，同时也会从历史上消失掉，成为历史上又一个重大悲剧的失掉的机会。

我们这个小国家，四面楚歌，问题重重，注定要向世界证明，除了向恐怖主义和勒索投降之外，还有一条路可走。

我们也注定要向世界证明，这种国际恐怖主义的瘟疫是可以应付得了的。现在在全世界各国，不论有什么可能使它们分化的政治歧见，必须团结一起，打击不承认权威、不知道疆界、不尊重主权、无视人类一切基本德性和尽量发挥人类野性的这个共同敌人。

我们带给安理会一个简单的信息：我们为我们所做的事情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已向世界证明，在安理会各理事国现在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个小国家中，在以色列的环境里，人的尊严、人的生命和人的自由具有最高的价值。我们不仅因为救出了一百多无辜的人——男子、妇女和儿童——的生命而感到自豪，也因为我们的行动对人类自由事业所具有的意义而感到自豪。

我们促请安理会向国际恐怖宣战，不论它在什么地方，都要取缔它，消灭它。我们促请这个机构，我们更促请各理事国和世界各国，团结一起，共同努力，把这些罪犯以及不论任何方式同他们的恶行合作的任何国家扬弃于人类社会之外。

在要求本机构采取行动时，我不能忽视它的局限，这些局限每天都为一项事实所证明，那就是在黎巴嫩发生了在今天困扰着全世界的最大悲剧的十五个月当中，本机构——安理会一直沈默无声，而一个国家则四分五裂，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数以万计的人受了伤，每天都有人在受苦受难。

让我提醒你们，当劫机事件发生的时候，安理会正在辩论所谓巴勒斯坦委员会的报告。当巴勒斯坦恐怖分子进行的恐怖行为正在发生的时候安全理事会就巴勒斯坦问题举行了四次会议。然而，安理会甚至不认为应当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呼吁释放无辜的老百姓。

如果这个机构未能采取行动，我们请世界上所有爱好自由的国家，一起在本机构的范围之外，就恐怖分子的问题，订立大家接受的行为规范，并毫不含糊地宣告绝对不与违犯这些规范和鼓励恐怖主义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

一旦劫机者找不到国家降落他们的飞机，就不会再发生劫机的事情，因为接受这种飞机降落，就意味着在空中交通、贸易、商业或是国际关系领域被排斥于世界社会或是世界社会的一部分之外。

我们为领导对国际恐怖主义进行的斗争而感到自豪。这场辩论对全世界而言，

是就能够影响世界上每一男子、妇女和儿童生命的这个问题采取行动的机会。由于私利或懦弱而不能对这一问题采取清楚明确立场的那些国家，将会受到全世界正直人士的指责和历史的鄙视。

在世事中，就算是政府，有时也必须不在私利考虑而是在道德考虑的指导之下，作出困难的决定。以色列就是在这种考虑的指导之下，不顾风险去救出它的公民的。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希望其他国家接受这些原则的指导呢？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我要以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的身分亲自作个说明。我只要澄清一点，这一点很简单。我要引用前一位杰出卓越的雄辩家刚才所说的话。他引了非洲统一组织一致谴责国际恐怖主义的决议。事实上，我自己也参加了这次辩论，我能追述我所说的话。我说：“只能用最严厉的惩罚来对付这种滔天罪行”。

不要让那个发言人在这里说非洲统一组织宽恕国际恐怖主义。非洲统一组织没有宽恕只有谴责。非洲统一组织通过其主席的话在这里提出的问题是侵犯领土完整的问题。

我保留对这个问题的发言权。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我说的话没有一句谴责非洲统一组织。我只想问非洲统一组织，以前有这个决议而现在却要求谴责以色列，这怎样自圆其说呢？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下一位发言人是肯尼亚代表穆尼瓦·韦亚基先生。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韦亚基先生（肯尼亚）：主席先生，请允许我首先对你和安全理事会所有其他理事国邀请我参加有关一个会员国侵略另一个主权会员国的重要辩论，表示感谢。我也要对你召开安理会这次会议采取了迅速行动表示谢谢。同时我也真正高兴和满意看到你，意大利大使，主持这个重要的辩论。你长期的外交经验和智慧毫无疑问将使这个庄严组织对眼前的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办法。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中国最杰出领导人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朱德先生阁下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六日不幸逝世，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致以我们最沉痛的哀悼。朱

德先生在他长久的革命事业里，一直是国家高级领导人，为中国作出了积极贡献。我要通过你，主席先生，请中国代表团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转达我们最深切的哀悼。

安理会在这里开会讨论以色列侵略乌干达的问题。令人遗憾的，乌干达在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 S/12124 号文件里提出控诉时，乌干达认为合适把肯尼亚拉进了这个事件。这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安理会所有理事国，事实上，联合国所有会员国都必须郑重地加以考虑。安理会应该谋求解决办法，不仅防止在乌干达并且防止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再发生这样的悲剧。肯尼亚坚决反对使用武力逼使民航飞机改变航线来解决政治问题。我们认为决不能接受这样的事情，因为这危害到无辜乘客的生命，他们同目前的政治冲突没有任何关连。因此，我们曾非常关心地密切注视被劫持的法航飞机六月二十七日星期日降落在乌干达的悲惨事件。我们注视并祷告被扣人质的安全。当其中的一百四十七人安全地获得释放时，我们感到非常兴奋。这实在是那些参加与劫持者谈判的人所取得的一项值得称赞的成就。释放了一百四十七名人质使我们大家都充满了希望，以为其余的人质也会安全地获得释放。非常遗憾，我们的希望落空了。结果还是使用武力释放其余的人质，从而造成不必要的生命损失。我们已对死者家属表示哀悼，我借这个机会再次请那些有国民在这次令人遗憾的悲惨事件丧失生命的国家政府向死者家属转达我们的同情和慰问。

同时，也非常遗憾，肯尼亚的敌人为了想要引起怀疑和分裂非洲，已毫不迟疑地利用这次扣留人质的悲惨事件，企图玷污我国的名誉。人人一定已在世界报刊上看到，劫持者所提出的释放人质的条件是释放据说被拘禁在若干国家，包括我国，的一些犯人。据说，肯尼亚目前拘禁五个巴勒斯坦犯人，把他们从肯尼亚监狱释放出来将保证这些人质的释放。这也不是第一次在国际报刊上出现这些虚构的犯人。我们知道，今年三月某一个邻国违背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宪章所规定的原则，对我国的一大部分提出领土要求。当这个国家，乌干达，面对肯尼亚全体

人民的坚决反对时，它就打算转移对肯尼亚侵略的企图，公然发表这些虚构巴勒斯坦犯人的杜撰报道。

肯尼亚知道这个国家为什么这样做，我们发现没有必要枉费心机答复长久以来已失去国际信誉的政权所发出的这种毫无根据的指控。说实话，从一九七一年到今天，我们经历了一长串的事件、诽谤、煽动、甚至谋杀，我们已经忍无可忍了。

因此可以了解，当最近这个事件里又引出同样虚构的巴勒斯坦犯人时，肯尼亚政府和人民当然非常愤慨和惊讶。肯尼亚已迅速明确地否认它的领土内拘禁任何巴勒斯坦犯人。我代表我国政府再次明确地否认这种旨在污辱我国信誉的诽谤谣言。大家都知道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斗争的立场，我不必在这个庄严的机构里重复说明。只要说我们将继续支持他们的正当权利，不管我们的敌人怎样企图在我们和巴勒斯坦人之间制造磨擦，就够了。

以色列突击队侵略乌干达的消息传来，使我们感到十分惊奇，决不是一些攻击我国的毫无根据指控所说的，我们事先知道并同以色列合作。正如我国副总统在毛里求斯最近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对这个问题的辩论中所说的：

“肯尼亚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被用为侵略邻国或世界任何其他国家的基地，更不会被用为侵略乌干达的基地，自从他们政变以来，肯尼亚一直以物质援助乌干达。”

肯尼亚第一次同以色列飞机接触是当这些飞机要求允许在内罗毕国际机场紧急降落。它们载了病人和受伤的人。肯尼亚根据纯粹人道主义的理由和按照国际法，有义务允许飞机降落。我们是一个谨慎的国家，我们有必要在机场采取预防的安全措施。任何其他国家也会这样做。因此，任何人把我们的安全部队在机场同有人指称肯尼亚与以色列合作两件事连系在一起，是十分荒谬的。肯尼亚对于在恩德培的人质所面临的问题采取人道主义的态度，远在上星期日的悲剧发生之

前就已经显示出来。肯尼亚政府曾允许法国航空公司在机场停泊飞机和设立特别医疗小组以进行紧急手术。事实上，法国航空公司飞机曾两次飞离安巴卡西机场到乌干达去载回一百四十七名被释放的人质。因此，我们允许以色列飞机在内罗毕降落的行动不是一种异常的行动，也不是可以被解释为同以色列合作的行动。

我要把这些话列入记录，肯尼亚非常关切地注意以色列在恩德培侵略乌干达的行为。我们同样要把我们反对以色列侵犯我们领空列入记录。正如我们在毛里求斯指出的，以色列在进行以武力救出在恩德培的人质的行动时，一定也侵犯了许多非洲和阿拉伯国家的领空。因此，仅是因为我们根据人道主义允许以色列飞机在内罗毕降落而单独指出我国，这对我国是不公平的。我们对所有被压迫人民的解放事业所承担的义务是绝对的。很少非洲国家能够超过肯尼亚在其独立和建国的斗争中在生命和物质两方面所遭受的极度牺牲。作为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国，我们继续尽我们的能力支持非洲殖民统治下人民的解放事业。因此，我们决不会同可能证明对非洲不友善的任何势力合作。

让我们在这里讨论如何避免导致许多象恩德培这种情况的方法。站起来伸手指控别人，这是很容易的事。我确信联合国的最高机关安全理事会将起而应付这种情况而不使它自己被对一个国家或其他国家毫无根据的指控所混淆，因为这样做将违背安理会的最高任务——维持国际和平。肯尼亚，如果愿意，可以指出许多被侵略的实例，这是那些一直渴望指控肯尼亚同侵略者合作的国家所干出来的。如果安理会想要这些实例的清单，我们随时可以提出。但是，主席先生，现在我请你和安理会注意到最新的指控，这种指控十足地表现了我们一向所忍受的捏造谎言的特性。我指的是一九七六年七月七日的乌干达广播，我现在引述如下：

“乌干达：军事发言人说，敌人飞机正接近乌干达。军事发言人希望通知全国，乌干达雷达侦测出三十架敌人飞机。这些飞机被认为是以色列和美国的，



从肯尼亚接近乌干达。军事发言人劝民众不要恐慌，但是密切注意任何可疑的西方间谍并通知政府注意这些人的活动。所有乌干达的医疗单位应该进行战斗准备，呼吁民众准备为紧急情况捐助输血。

“军事发言人说，乌干达有能力防卫自己，不需援助，虽然若干友好国家准备空运或其他方法帮助我们防卫。

“他呼吁安全部队和每一个男女保持警戒。如果任何乌干达人发现任何敌人飞机降落在接近他的地区的任何地方，用你拿得到的任何武器迅速地解决入侵者，因为敌人是无情的。

“军事发言人进一步劝告全国经常收听乌干达广播公司的广播以了解进一步的发展。”

这些以色列和美国飞机据称将从肯尼亚飞来。但是肯尼亚方面并没有飞机飞来。问题是：这个谎话故意捏造来混淆乌干达人并激起他们的情绪反对肯尼亚，其用意是否企图掩护军事飞机从什么地方飞到乌干达呢？

我国代表团无意继续浪费安理会的宝贵时间。可是，我要重申下列几点做为结束：

第一，肯尼亚没有、从来没有巴勒斯坦犯人。

第二，肯尼亚事先不知道也没有同以色列合作侵略乌干达。正好相反，肯尼亚也是遭以色列侵略领空的受害者。正如我前面所说的，我们允许以色列飞机在内罗毕降落，这是在恩德培事件之后，不是之前，纯然是根据人道主义按照国际法的。

第三，肯尼亚将按照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定永远本着睦邻精神、尊重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继续与其邻国包括乌干达合作。关于这一点，我

们严格遵守所有会员国主权平等；不干涉他国内政；尊重每个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可剥夺的独立存在权利等原则。我们预期其他国家也尊重这些原则。但是如果任何人不这样做，那肯尼亚随时准备以任何可用的方法防卫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第四，肯尼亚作为联合国的忠诚会员国，将执行本安理会可能通过的任何决议的规定，作为阻止和事实上消除恩德培事件重复发生的一种措施。

主席：我感谢肯尼亚外交部长对我的称赞。

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位发言人是卡塔尔代表，他希望以他作为阿拉伯集团现任主席的身分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开始发言。

贾马勒先生（卡塔尔）：主席先生，我以本月份阿拉伯集团主席的身分，趁此机会祝贺你担任七月份安全理事会的主席。你卓越的经验 and 机智将是这一个庄严理事会的审议工作一定成功的伟大因素。

我也要向安理会六月份的主席、圭亚那常任代表杰克逊大使阁下致敬。他的熟练和政治家的风度，已经差不多使我们获得一个能使中东冲突更接近和平与正义的决议。

主席先生，我也要向你表示感谢，并通过你向这一个庄严理事会的理事国表示感谢，给我这一个就这个重要问题在安理会上发言的机会。

我能够衷心欢迎乌干达共和国外交部长戈马·奥里斯·阿卜达拉先生阁下担任乌干达出席安全理事会代表团的团长，确实是很大的荣幸。我代表阿拉伯集团对乌干达生命的无辜丧亡向乌干达共和国政府和人民表示真诚的慰问和同情。

我也要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常任代表就朱德先生之丧表示诚恳的唁吊，请中国代表向中国政府和伟大的中国人民转达我们深切的慰问。

我也要趁这个机会欢迎毛里求斯外交部长阁下和肯尼亚外交部长阁下加入我们中间，并祝福他们。

我们再次在此集会，讨论还是这一个硬栽到中东的种族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爱好和平国家的又一次公然侵略。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犹太复国主义的侵略部队发动敢死队侵略联合国会员国乌干达，造成许多无辜丧亡，对这个发展中的非洲国家造成严重的财产损失。

虽然我们在此不是要讨论法航飞机被劫持的事，但是我希望请各会员国注意一下20个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外交部长曾对那些行动，特别是危及无辜平民生命的那些行动加以谴责；巴解组织且曾应法国政府的要求，试图向劫机者说情。该机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着陆时，有275名生命有危险的平民，乌干达共和国总统伊迪·阿明阁下勇敢地负起责任，给这些受难人员提供食物医疗，并开

始释放人质的谈判。

乌干达总统于一九七六年六月三十日取得了40名人质的释放。七月一日，又取得100名人质的释放和谈判期限的延长，同时他向各有关国家转达了现在已为举世所知的劫持者的要求，各有关国家也都表示愿意避免流血，同劫持者谈判。但是最后事实表明，这一犹太复国主义国宣布愿意谈判和避免流血，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侵略。在本来应该进行谈判，挽救无辜人民的生命的时候，以色列却派了突击队攻入独立自主的乌干达领土，做出卑鄙的恐怖行为，造成了不必要的流血。

今日我们大家所该注意的问题是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胆敢公然破坏另一个会员国的领土完整，派部队降落该国领土威胁数十名平民和保安部队的生命。我们记得：当时并没有对乌干达宣战。甚至官方并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暗示。相反地，当以色列凶手在准备侵略时，以色列政府正在谎骗世界，宣布愿意谈判，要保证它对这一在非洲腹地的、不起疑心的、和平的国家的突袭的成功。同样使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一恐怖国家的不法行为，尽管危及世界和平与安全公然违犯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却还在受到国际上若干成员的欢呼。

这等于说强国可以不必宣战随时把部队降落到小国的领土上，无所忌惮地进行侵略。凡是在以色列恐怖主义者攻击乌干达时期或前、后注意以色列新闻报道的人，特别是从他们对死了四个以色列人的报道同时死了许多乌干达人的报道中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对于黑白生命的价值态度同罗得西亚人和南非人有相似之处。

因此，我们要求安全理事会以最严厉的措辞，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对那些它所说的话可能被误会为是鼓励这种海盗行径的政府表示非难，并考虑制裁这一《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的长期破坏者的方式，包括在它保证尊重《宪章》的一切规定和各联合国机构的决议之前，暂停其会员国的资格在内。

说了这一堆话以后，我还要补充一点是，我们的耐心快要完了。在最公然的侵略行为受到联合国杰出会员国的认许，和一个常任理事国否决权的保护，那个常任理事国一点也不理会种族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危险和对世界和平

与安全的威胁时，假装在讨论世界秩序和正义，是再也不会有人相信的。

联合国已到了一个须作抉择的重要关头；它可以重申其权力，以行动来支持它的决定，它也可以走一条不光荣和受人漠视的路。象以色列这样一个狂妄的国家可以这样肆无忌惮地违抗联合国，那联合国还有什么用处？全世界都在盼望一项可以有些作用的决定，来制止这种公然的侵略。现在这一个庄严的理事会应该明明白白地对以色列说：全世界已经受够了犹太复国主义国的挑衅，现在它必须停止伪装，毫无争辩地遵守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应循条件，否则就没有资格做联合国的会员国。

我们坚定地认为，安全理事会一定要通过一个一致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侵略的决议，才算尽到责任。

主席：我感谢卡塔尔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勒孔特先生（法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为我国代表团祝贺你担任这一个责任重大的职位。六月二十八日你说过，你希望安理会经过一个工作特别繁重的月份，之后，七月份能够比较轻松。不幸地，这个希望没有实现。我为此替你感到遗憾，但是对我们自己却又并不怎样地感到遗憾，因为我们在这样特别困难的情况下，能从你丰富的经验和杰出的才能中得到益处。法国代表团特别感到高兴的是看到由一个拉丁国家、一个姐妹国的杰出代表来主持这种工作因为它是我们两国并肩参与的欧洲建设工作中一个极重要的伙伴。

我也要向圭亚那常任代表致谢，上个月他受到了严厉的考验，同时才华横溢地表现出我们知道是他的杰出品质的礼貌和政治机智。六月份在安全理事会记事本上的应该大书特书不但是因为它处理的事务特别多，而且是因为它先有伟大的杰克逊大使出任主席，稍后又荣幸地有圭亚那外交部长来指导我们的工作。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为朱德元帅的去世向我们的中国同僚表示慰问，是一件痛苦的职务。朱德元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人物，他在中国的建国和巩固工作中

作出过卓越的贡献。 我国代表团响应此地悼念他时所作出的颂辞。

我要求在这第一次会议上就发言，是因为我国代表团能够为安理会现在讨论的问题提出证据。 我们认为法国自始就与这恩德培事件有不解的关系，法国提出来的证据，能够帮助我们看清所要讨论的事实；这意味着法国必须在这次讨论中负起积极的作用。

我们都知道，这件事开始于六月二十七日，一架法国航空公司的大型客机从特拉维夫到巴黎的路上在科孚上空被劫持，机上有旅客 250 名。

法国当局在获悉劫持事件发生后，立即通知一些法国大使馆，包括坎帕拉的法国大使馆在内，请它们采取措施准许这架飞机着陆，因为它很快就快耗尽燃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坎帕拉的大使为这事同乌干达当局打交道，乌干达当局立刻准许这架飞机着陆。

六月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四十分这架大型客机的恩德培降落。 法国大使到了机场，无法同劫持者或机员和旅客建立直接联系。 伊迪·阿明元帅也到了机场。

法国大使立刻同乌干达当局和伊迪·阿明元帅打交道，希望取得旅客和机员的释放。 阿明元帅在下午七时接见了法国大使。 法国大使还向乌干达国家元首转递了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的私信，希望取得这一应受谴责和应予坚定对付的行动的受难者，即旅客和机员的释放。

通过伊迪·阿明的努力，几分钟后旅客被准许离开飞机，并得到了一些食物。 还有了一名医生来照顾他们。 从那时起，似乎至少有一部分旅客是由不属于第一批劫持者的人在监视；乌干达士兵则在 50 米以外担任外圈的安全任务。

六月二十九日下午一时十五分，伊迪·阿明元帅向法国大使转达劫机者所定放回人质的条件。 索马里大使当时也在场。 他强调他是以资深的阿拉伯大使的资格被选出来代表劫持者的。 之后，就把劫持者的一切条件转给了各个有关的政府。

六月三十日，在坎帕拉的巴解组织代表通知我们大使说，劫持者可能在当天释

放妇女儿童。有四十七名旅客确实在下午一时被释放了。

当天下午五时，我们从当地的无线电台得知劫持者已对乌干达总统说，如果各有关国家没有在七月一日下午三时以前满足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准备炸毁飞机和所有还未释放的人质。

当天晚上，伊迪·阿明元帅接见了法国大使，法国大使要求阿明元帅设法争取更多时间。

到七月一日，在过了限期之后不久，乌干达电台宣布由于伊迪·阿明元帅调解的结果，劫机者同意第一：除以色列国民和有双重国籍的以色列人外，再释放约一百名人质；第二：把限期延到七月四日上午十一时。全体机员要求在释放所有旅客之后才释放他们。

七月一日上午晚些时候，巴黎的以色列大使通知法国外交部长说，以色列政府准备释放劫持者所提名单上的“若干”囚犯，以换取人质的释放。他要求驻坎帕拉的法国大使把这个消息通知乌干达总统。以色列政府表示希望通过法国的调解还可以谈判互换人质的条件。

同天下午三时，大型客机上的100名旅客确已被释放而由索马里大使移交给了法国大使。当天下午乌干达总统接见了法国大使，索马里大使也在场。法国大使向他们转交了以色列政府的来文，并建议请联合国秘书长出来斡旋。

在一天快完的时候，索马里大使把劫持者的答复通知我们驻坎帕拉的大使，他们说他们准备研究各有关国家释放所禁囚犯的条件；并声明他们反对要联合国秘书长出面斡旋的建议。

同时，法国外交部已通知以色列当局，它同意命令法国大使根据各国政府的答复着手进行释放人质的谈判。

七月二日，以色列大使宣布以色列政府的立场：它要先谈好交换的条件。

以色列打算在中立国交换人质的计划是由我们在坎帕拉的大使于七月三日上午

转交给索马里大使，请他转达劫持者的。稍迟些索马里大使向我们的大使转达了劫持者的反提案，其中之一是人质的交换必须在恩德培进行。

同天，我们大使要求索马里大使延长最后通牒的期限。因为伊迪·阿明元帅不在乌干达，我们大使便向乌干达外交部长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几小时后，索马里大使通知说最后通牒的期限——七日四日上午十一时——不能延长。

但是，在乌干达国家元首从毛里求斯回来后通知我们大使说，各有关国家应在规定时间内把预备把囚犯载送到坎帕拉送的班机号码通知他。这个消息由法国外交部长转达给巴黎的以色列大使馆。

七月四日上午十二时三十分，我们在坎帕拉的大使以电话通知巴黎的外交部长说，恩德培机场已经发生战斗。

半小时后以色列大使以电话向索瓦尼亚格先生转达了伊加尔·阿隆的话说，以色列刚刚完成了释放人质的军事行动。当晚法国总统收到了以色列总理的电报，证实了那些事实。

这些是我被要求在安全理事会开始讨论时提请安理会注意的情报。

我要说的是，因为劫持者的反对，以致秘书长不能象我们希望的那样来调停这件事，使我们感到非常遗憾。我们觉得秘书长伟大的精神力量在这一件影响到本组织若干会员国的事件中，可以是一件宝贵的资产。而且，由于他受到普遍的信任，由他出来调停可能使与这一件牵涉若干人命的错综复杂的事件有关的各方，都能够得到必要的保证。可惜我们没有能让他发挥积极的作用。然而，我们还是要对于他的努力，特别是他在毛里求斯时的努力，我们表示热诚的感谢。

从我刚才叙述的事实来看，相当清楚地表明，我们现在所要讨论的这件事情错综复杂，经过和责任缠在一起，分不清楚。

暴力和非法行动突出了这个悲惨事件，这是不能否认的。最初引起这件事情的劫持民航飞机和俘虏无辜人质的行动，是一种特别不能容忍的违反国际道德和万国



法的行为，无论其目的何在都是不能为其辩护的，国际社会必须采取并坚决执行有效措施来予以制止。

法国代表团在此地或其他地方还会有机会再谈到这个扰人的问题。任何一个旅行者或任何一个无辜的旁观者都会面临着日益增加的危险。而且，恐怖主义的行动显然是危害国际关系的稳定，和破坏国与国之间的信任的。这些行动违反了使人类可以共处的根本原则。因此，它们应该受到联合国的注意。

最后，法国代表团要在讨论的这一阶段在对人质的获释表示高兴之余，也要对无辜的受害者的丧亡表示哀悼。

主席：谢谢法国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我特别感谢他提到我们两国之间的合作，尤其关于我们两国正在一起为欧洲的建设而努力。

下一个发言者是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发言。

奥约诺先生（喀麦隆联合共和国）：主席先生，我首先要对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七月份的主席，愉快地致以我们最热烈和友好的祝贺。我们特别高兴，因为贵国意大利，和喀麦隆在双边和多边层次上都有良好的合作成绩，也因为我们认识你本人，非常敬佩你对本组织的问题经验丰富，是一个有才干的人和外交家——这种才干是要使今后这一系列会议成功所不可或缺的。

我也要代表我国代表团对中国人民的伟大先驱者朱德先生的逝世，向中国大使表示哀悼。

我国代表团感谢安理会让我们参与这场重要的辩论，讨论以色列国家对乌干达共和国——我们的兄弟之邦，非洲统一组织和联合国的成员，冷酷无情犯下的野蛮而阴险的侵略行为。

对于造成一百多人死亡和许多乌干达军事人员受伤的这种恐怖主义的暴行，我们感到愤怒和憎恶。这个暴行也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乌干达武装部队的若干架军用和民用飞机被毁，恩德培机场的一些建筑物和其他设施也被破坏。

乌干达人民如今正在经历著一个重大的灾难，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怯懦的武力的行动的侵犯、屈辱和伤害，这引起了非洲以及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的势力的愤怒和谴责。

事实仍然是，某些有偏见人士急忙指控乌干达国家元首与突击队共谋，尽管飞机机长作为一个见证人对此事有远为谨慎的意见，这些意见披露在七月七日他在巴黎对记者的谈话中，其摘要载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八日的《纽约时报》。

在乌干达人民的这个灾难时刻，喀麦隆元首哈吉·阿赫马杜·阿希乔阁下的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并保证我国对乌干达共和国的同情、团结和支持。

谴责以色列侵略乌干达，任何强烈的言词都嫌不足。这项侵略行为发生在国际社会又一次面临它所痛惜和谴责的空中强盗行为，同时又正在深深地关怀著它经常想保全的人质的生命的时候，国际社会当然期望结果不要流血——特别是因为乌干

达元首已亲自积极参与此事；的确，他的努力已导致了在六月三十日释放了 47 位旅客—妇女、儿童和老人。

伊迪·阿明总统受到了首次成功的鼓励，又受到了以色列答应与突击队团员谈判所引起的希望的鼓励，当他正继续努力使其余人质得到释放的时候，以色列发动了侵略。

以色列不肯冒能够防止流血的和平解决的危险。

事实就是如此。这是为什么我们不认为任何事后使以色列的行动合法和制造混乱的尝试是有说服力或有确实根据的。

对喀麦隆来说，情况很清楚：以色列用三架军机空降从正规军队中挑选出的突击队，主动攻击一个与以色列远隔三千公里的主权国家乌干达的领土。这样做，以色列故意发动了对乌干达的敌对行为，因此按国际法的定义，它是这个事件中的侵略者。

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必须强烈谴责这项野蛮行为，它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国际法的标准，嘲笑了联合国宪章的字面和精神，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说：

“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

按照宪章的精神，这条禁令是说，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各会员国有责任用和平方法解决它们的国际争端。我完全不用提醒你们，我们这个组织不是献给无政府主义或是“强权即公理”概念的，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它的被共同接受的原则和规章必须受到严格的尊重，如有违反，必须给予足够的惩罚。

我们这个组织的墙角石是，除非我们想要危害目前形式的国际合作，和确要危害一个还未拥有新式复杂的探测和遏阻系统的国家的生存本身，不能有任何正当理由可使用武力侵犯一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

正是为了要庄严地捍卫和重申这些神圣的原则，安理会必须考虑乌干达政府的要求，毫不含糊地谴责以色列的侵略行为。

以色列假装同意谈判释放其余的人质，只是为了争取时间、制造错觉和哄骗国际舆论，以便顺利进行其对乌干达的恶毒阴谋。

遗憾的是，以色列所说的和平意图同它所作所为完全不符，但人们似乎对于以色列不断有系统地和无阻碍地使用构成它政治行为重要部分的欺骗手腕和蛮横军事力量已经司空见惯。如今已是时候，安全理事会应设法终止这种事态，无保留地和全体一致地谴责以色列对乌干达共和国的公然侵略。

以色列也必须赔偿因其野蛮行为造成的生命损失和物质损害。

总之，非洲和世界舆论的目光正注视着我们的辩论，我们辩论腔调的坚决必须能同他们凌厉的目光相配称。

但是非洲和世界舆论期望着什么？他们期望安理会采取坚决行动以制止心醉于权力幻想的未来可能的侵略者侵犯我们组织会员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把联合国宪章所崇奉的和平与国际安全的神圣原则践踏在脚下。

主席：谢谢喀麦隆联合共和国的我们同事对我本人的夸奖。我非常感谢他提到存在于喀麦隆与意大利之间的友谊。

赖先生（中国）：在今天的会议上肯尼亚外长阁下以及毛里塔尼亚、卡塔尔、法国和喀麦隆等国代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朱德委员长的逝世表示了悼念，我代表中国代表团对他们所表达的诚挚感情表示深切的谢意。

主席先生，

本月四日凌晨，以色列武装人员乘坐三架军用飞机，悍然入侵并偷袭乌干达恩德培机场，打死乌干达军队官兵一百余人，击毁乌干达军用和民用飞机多架，并使恩德培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这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有预谋、有计划地对一个主权国家所进行的赤裸裸的侵略，是对联合国宪章的粗暴践踏和破坏，也进一步暴露了它坚持同阿拉伯和非洲人民为敌的面目。中国政府和人民对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肆无忌惮的侵略行径表示愤慨，并给予强烈谴责。

众所周知，我们一向不赞成暗杀、绑架、劫持飞机等冒险恐怖活动。但是，这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以色列对一个主权国家进行武装侵略的借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长期以来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进行疯狂侵略和野蛮屠杀，罪行累累，至今仍怙

恶不悛。这次它又对一个非洲主权国家悍然发动武装侵略。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妄图制造任何借口来为其侵略罪行进行辩解和洗刷，都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而也只能是徒劳的。

中国代表团主张：安理会应作出决议，支持非统组织首脑会议和非洲国家的正义要求，谴责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对乌干达的侵略暴行；责成以色列当局向乌干达赔偿一切损失，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谢谢你，主席先生。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已没有人要在今天的辩论中发言。在请想要行使答辩权的人发言以前，我要请毛里求斯代表发言，他要求澄清一个要点。

哈罗德·沃尔特爵士（毛里求斯）：我要澄清的一个要点是为了整个安理会的利益，我只想问法国代表一个问题。我认为这回答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安理会对事实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法国代表曾在某一点说：

“法国当局在获悉劫机事件发生后，立即通知驻坎伯拉等法国大使馆提高警惕，要求它们采取措施准许这架飞机着陆，因为燃料似乎不久就将用尽了”。

（上文，英文本第82页）

请问法国代表，这个信息是在何时送达坎伯拉的？

勒孔特先生（法国）：我必须向毛里求斯外交部长歉然承认，我此时此地无法告诉他我国大使把飞机着陆的信息送达乌干达当局的准确时间。我能作的只是重说一次，我们要求让飞机着陆，因为看来它只能再飞十五分钟。

我既然在说话，我想告诉毛里求斯外交部长，在星期一我们可再谈他提出的问题。

主席：我现在请想要行使答辩权的代表们发言。

基希亚先生（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我们听到了犹太复国主义本体代表惯常的指控和捏造。我要保留本代表团在轮到我发言的时候答辩这些指控的权利。因为现在时间已晚，已过九点钟了，我只要把一些意见列入记录。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祝贺你担任了本月份安理会的主席。利比亚代表团对你在进行这场极重要辩论期间担任主席表示满意。

贵国和我国是邻国。我们都是地中海国家。我们有长期交往的历史。我们之间的关系时好时坏。贵国曾两次兼并我国——一次在罗马帝国时期，一次在现代的意大利。我国也参与了占领贵国几个地方达数个世纪之久，把它划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然而，我很高兴地说，现在我们两国有着友好和邻国和睦相处的关系，我们很高兴看到民族之间的仇恨并非恒久不变的。

主席先生，在我们参加安理会工作的第一天，你对我表示欢迎时说，意大利和利比亚两国代表在安全理事会里一起工作是时代在变化的一个象征。先生，我赞同你的话，对贵国和我国在一九五六年同一天进入联合国表示满意，现在，过去的统治者和过去的被统治者在一起成为朋友和自由人民的代表。

我也要向我的朋友和兄弟，圭亚那杰克逊大使对他在上月份领导我们工作有方表示我国代表团的感谢和满意。

我代表我国代表团，也要向中国人民及政府对朱德元帅的逝世表示哀悼。

我已说过我要保留在晚些时候对犹太复国主义代表行使我的更详尽地答辩，但是现在我先要表示几点意见。

人们实在应该钦佩犹太复国主义代表的厚颜无耻。他象以往一样忠于他的传统。他的座右铭是说谎、说谎、再说谎。就象他的主子戈贝尔一度说过的，也许最后有这样一天，我们会相信你。还有一法就是嚷嚷、再嚷嚷以掩饰你的论据站不住脚。然而，这一切都没有用，因为不论他提出什么论据，他都不能小看在这

里出席会议各成员的才智，或隐藏以色列的真面目，这个真面目可以用几个字作一总结：国家恐怖主义。

以色列代表妄图对人命的损失洒几点鳄鱼泪。不论那些人命是乌干达人的或是其他人的生命，人命的损失难道不是他的政府的野蛮行动引起的吗？从最开始起，以色列政府就决心攻击乌干达，因为它不能饶恕英雄的乌干达人民和政府揭露了以色列在非洲丑陋的真面目和揭露了它和南非及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勾结的真相。

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建国史就是一部恐怖主义史。它那种恐怖主义是众所周知的。我不打算详细谈。将来我再细谈。我不打算详细谈或列一张很长的清单，但是我要举出几个够有力的例子。

谁冷血地杀害了联合国调解专员伯纳多特伯爵？谁暗杀了莫因爵士？谁使杀害了伯纳多特伯爵的凶手成为坐在以色列内阁座位上的民众英雄？谁在一九六九年发动对贝鲁特机场野蛮的突击？谁击落了利比亚民航机，杀害了许多包括妇孺在内的平民？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架飞机也是由法国人驾驶的。这张清单是列不完的。

从最开始起，以色列政府就要利用这次劫机事件作为袭击乌干达的借口。我想在要引用拉宾先生在七月四日得意洋洋向以色列议会说的一句话：

“以色列国防军和谍报组织没有浪费一分一秒考虑、规划和准备所需的时间。”

这句话是在他外交部长七月一日在议会中说了下列几句话之后讲的：

“将来我还会多谈一些。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所有人质都安全。”

全世界都知道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从开始起就斥责了这次劫机事件，并派遣了它的一位最高级代表搭乘埃及专机前往，以便会同法国大使参加在坎帕拉举行的谈判，正

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代表还妄图使人们对联合国和世界社会大多数国家公认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行为引起怀疑。当全世界都公认战斗的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认真的、诚实而有道义的时候，劫持者拒绝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调解，甚至以色列的保护者，甚至美国都感谢它在帮助撤离美国公民的工作上发挥了作用。

以色列代表想撇开他的政府策划并执行对一个独立主权国和联合国会员国的侵略行为这一主要问题不谈。如果安理会容忍这种侵略，就等于开亮了绿灯，允许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擅自处理问题，并在它自己选定的任何借口下侵略其他国家。我们认为安理会应当在这里适用大家都愿意适用的宪章规定。安理会应该用最严厉的措词谴责以色列这种傲慢、蛮横的侵略行为。如果因为这个或那个国家的阻挠使得安理会不能这样去做，则那些阻挠的国家将来要负起由他们行动引起的后果。

犹太复国主义者提到了奥斯威茨、达绍和布兴瓦尔德。他说，“决不再让属于历史遗迹的奥斯威茨、达绍、布兴瓦尔德重新回到世上。”（上文，第38—40页）。我说达绍、奥斯威茨和布兴瓦尔德都不是过去的事，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它们仍然存在，这次唯一不同的是角色颠倒过来，那些过去的受害者——或假装的受害者——现在是虐待者。现在，犹太复国主义种族主义者已在对巴勒斯坦人民施行种族主义的、罪恶的行为和政策，南非其他种族主义政权也在对非洲人民这样干。

赫佐格先生，你显然没有吸取达绍、奥斯威茨和布兴瓦尔德的教训。然而你从经验中学到了一些东西。我们承认你过去是，现在也是纳粹的优秀门徒。你比你的纳粹主子们干得更好。你改良了他们的技巧，把他们的作风和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赫佐格先生，你只是想用捏造和谎言来掩盖对乌干达所犯的蛮横罪行。你的所作所为事实上背信弃义的严重罪行。你先向全世界宣布打算谈判。甚至法国代表都说你向法国表示愿意谈判。世人都相信你的话。然而你并没有参加



谈判诚意，你袖里藏刀来参加谈判。你从我们乌干达兄弟的诚意里占了便宜。赫佐格先生，你竟敢在事后侈谈道义。现在，人人都知道你的道义是什么货色。首先，当犹太复国主义罪犯和种族主义者到安全理事会和联合国来要求和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谈判的时候，人人都知道他们所谓的“谈判”是什么货色。

我说过，我不想谈太久。然而赫佐格先生的发言对我国真是宽大极了。我佩服、我有很深感受他竟如此痛恨我国和我国领袖。他说利比亚在这个事件里起了“中心的作用”，他说：“这个国家”——他指利比亚——“在今天世界上助长和鼓励国际恐怖的中心地位。”（上文，第36页）。他说：“这个国家多年来担任着全世界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国际恐怖运动的军需官。”（上文，第37页）。

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军需官。我们尽力帮助我们的兄弟和解放运动。我们帮助和训练那些为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种族隔离而斗争的人，我们还要继续这样做。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会失去我们存在的目的。

赫佐格先生也象以前一样，提起了阿拉伯人之间的问题。我说过，我们知道我们之间有问题、有争执。我们都是发展中的国家，在为我们的进展、团结和解放而斗争。在不论大小所有国家的历史上都曾为解放和团结作过斗争。我说过，我们阿拉伯人还未曾结束我们的内战。美国有过他自己的内战。主席先生，贵国也有过内战。赫佐格先生的出生国，爱尔兰现在正在进行一种兼有殖民和内战性质的斗争。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斗争，我们阿拉伯人当然也有我们的问题。我们知道我们和一些邻邦，一些兄弟之间有问题，然而，就象阿拉伯俗语所说，这些只是夏天的乌云，很快就会消逝的。赫佐格先生，你将会发现我们在以色列侵略之前团结起来。

赫佐格先生也说过利比亚不配以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身分出席。请他注意，我们是由130个主权国家投票所选出的。我们是包括48国的非洲集团的候选国。

如果我们这次毕竟把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这也就是我国历史和我国解放斗争的得到一种重视的第一次。

我国为解放事业斗争了40年，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口，我国是为独立而战的贫穷国家，石油只是到了一九六四年才发现的。我们吃尽苦头，我说过，损失了百分之四十的人口。因此，如果我们在这里出席安全理事会，这件事就表示国际社会对我们的重视。我们为得到了使我们能出席安理会的128票而感到自豪。其余对利比亚所报的反对票也许是以色列、它的朋友、保护者和走狗们投的。

今晚我不想再多说了，但我保留我再度发言权。答复犹太复国主义本体代表的指控，冷讽热嘲地造谣生事和谎言。

主席：我深切感谢基希亚大使刚才关于我们两国间关系的发言。我完全赞成他的话，相互占领是过去的事，过去的事一去不复返了，回顾过去是一个坏习惯，我们盼望基于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业已恢复的友好关系能日益增进。

阿卜达拉先生（乌干达）：我现在不想充分回答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代表所说的话，但有一个重要问题我想立即回答。我希望以后有机会详细回答那些对乌干达和其他非洲友好国家所作的毫无根据的指责。

本世界组织于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获悉以色列入侵乌干达的事件。大家知道，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达达元帅和乌干达全体人民作出了各种努力来挽救二百五十名人质的性命。

在七月四日星期天凌晨以色列入侵前，阿明总统已经成功地使一半的人质获得释放。我国总统甚至缩短在毛里求斯逗留的时间，冒着生命的危险继续进行谈判，从而挽救其他人质的性命。我国总统基于人道立场，不仅关心所有人质的释放，而且也关心他们的福利。为此目的，向所有人质毫无歧视地提供了食物和医药服务等生活基本必需品。

正是在这种精神下，多拉·布洛克夫人由于有一块食物卡住了喉咙而立即被送到乌干达一家最好的医院去治疗。当她在七月三日星期六傍晚身体有所好转时，医院当局便把她送回归恩德培机场同其他人质会合。根据乌干达政府与劫持者之间的谅解，所以这样做是要使那时仍然留在恩德培机场的人质的性命不致受到危害。

以色列入侵劫持者扣留多拉·布洛克夫人等人质的地方恩德培机场，犯下了赤裸裸的侵略罪行。正如安理会已经获知的那样，以色列人用各种武器滥加射击。在这个射击过程中，有许多人被打死，其中包括乌干达士兵、劫持者、人质和以色列入侵部队成员。入侵部队成员将所有死的、伤的和其他人质都带走。他们又把入侵部队所有成员，不论死伤，也都带走。因此，应该由以色列来回答关于多拉·布洛克夫人的下落问题。

根据新闻报道和外交界消息，有一位外交家在星期天看到多拉·布洛克夫人在医院里。这些报道和消息都是捏造，没有具体的资料证明这件事。每一个人都知道对乌干达人民发动的侵略，许多人因此而丧失了性命，我国总统尽力设法和平解决，可是以色列的侵略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应该由以色列负责回答关于多拉·

布洛克夫人的下落问题。

我已经尽力避免提到肯尼亚，因为它是乌干达的姐妹国家和邻国。不幸的是，肯尼亚代表在其发言中提到了乌干达。我心里想到非洲统一组织，毛里求斯外长现在在这里，因此不想多提肯尼亚。

因此，我希望安理会确切注意肯尼亚在这次入侵事件中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七月一日，以色列派遣一军事代表团到内罗比，向肯尼亚当局传达入侵的决定，并且很可能地要取得当局对这项行动的同意和支援。

我们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这项请求立即得到了批准。除了我们的情报来源之外，我愿引用詹姆斯·麦克马纳斯从内罗比发出的关于这件事的报道，这个报道载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星期一的伦敦《卫报》上，部分内容如下：

“虽然肯尼亚政府没有对袭击事件发表声明，而且未必会这样做，这里的官员却尽量冲淡政府在这项行动中所起的作用。从内罗比所得消息，事件的发生顺序如下：

“星期天晚上当地时间九点，即英国时间下午七点，繁忙的肯尼亚国际机场的许多目击者报道说：他们看到有三架军队运输机据说是以色列的C-131型军用飞机抵达机场。

“其后不久，机场休息室便充作临时野战医院，备有手术台、麻醉设备和氧气罐。肯尼亚正规军和准军事性的一般勤务组成员已经在较早时候开入机场保护机场地区安全。

“大约在午夜时分，这架载有以色列军队和反恐怖分子小组的成员的飞机起飞了，开始其飞向思德培的一小时飞行。”

从这篇报道可以明显看出，以色列入侵飞机不单允许飞越肯尼亚，而且在袭击乌干达和返回以色列的途中还获得在肯尼亚着陆和勤务的便利。

另一家英国报纸《金融时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五日星期一报道了另一个关于袭

击事件的说法，部分内容如下：

“根据来自内罗比的报道，有大批以色列保安人员在上星期抵达该城市，并且当以色列飞机在恩巴卡西机场加油和给予受伤人员医药照顾时，显然看到他们同肯尼亚保安部队在机场出现。”

虽然我们在这份报告里证明非洲统一组织中的一个姐妹邻邦参与策划入侵我国的事件，可是，我们想向安理会声明，乌干达仍然把肯尼亚的人民看作是自己的兄弟姐妹；我们希望，肯尼亚当局是由于某种原因被唆使参与这次的滔天罪行。

因此，乌干达不打算肯尼亚为了这项共谋而对它采取报复的措施。

我愿在此讲一讲我国总统在非洲统一组织最高级会议在毛里求斯开幕时的讲话。他还向所有非洲统一组织的成员分发小册子；证明他没有任何野心要侵吞肯尼亚的寸土，证明他和全体乌干达人民是尊重非洲统一组织的宪章的。幸运的是，非洲统一组织的现任主席在这里。他将会对我的肯尼亚同事指责乌干达要求占有肯尼亚的土地的发言作更多的说明。

赫佐格先生（以色列）：乌干达代表关于多拉·布洛克夫人所说的话使人十分关切，因为他所说的关于她的话是一派胡言；不符合已经发表的事实，也不符合不单以色列知道而且其他国家也知道的事实。

让我引用《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的报道：

“……一位政府大臣昨天在英国下议院说，一位高级专员在以色列袭击的第二天到医院去探望布洛克夫人。”

那就是在一九七六年七月四日。

“外交人员报道说，她由两位便装的男人看守着，他在一个小时后回来，但他没有获准去看她。

“穆拉戈医院方面说，根据他们的记录，布洛克夫人是上星期五入院的，但

是关于她的治疗情况和出院,则没有记录可查。”(《纽约时报》,一九七六年七月九日第 A 2 版)

注意到乌干达代表在这一点所作的发言的真实性之后,我想我们可以对他在他认为适当向安理会所作的其他一切发言的真实性作出结论。

巴蒂斯库姆先生 (联合王国): 我国代表团今天本来不打算讲话,只是由于乌干达代表提到了布洛克夫人事例,我现在要说几句话。很明显,这件事引起了我国极大的关怀。

在乌干达的最高专员——他最近已回到乌干达——同阿明总统会谈过,阿明总统答应就这件事进一步发表声明。因此,我在目前不想就这件事情再说些什么。

我只想谈,鉴于乌干达代表所作的关于布洛克夫人事例的发言,我们要保留权利重谈这件事,并在这次辩论较后时候发言时予以回答。

主席: 今晚没有其他人要求发言了。经过我同大家协商之后,一般同意安理会应在七月十二日星期一恢复辩论。因此,下次会议将于星期一早上十时三十分举行。

下午九时五十分散会